

六次。这些书刊名字大多忘了，记起来的有《记贺龙将军》《记彭德怀将军》《窃国大盗袁世凯》《民主评论》《民主论坛》《星期论坛》《晋绥停战见闻》等三四十种。那时在兰州邮局，有个邮务佐是熟人，有他关照，飞机一到就能很快取走，拆后定价交赵的书店出售。这个书店白天不开门，到下班晚饭后营业，直到晚上十时才关门。书刊一经摆出，很快销售一空。虽然我主观上没有什么革命的思想目的；客观上倒起了一点为党宣传的作用。那时北平正是军调时期，国共三人小组正在谈判，一时革命民主刊物如雨后春笋。有人也曾劝我说运这些东西危险，我不以为然，既然北平能发行，为什么不能运来兰州呢？那还叫什么民主自由？其实我太天真，中统特务早就注意上我，在我被捕受审时，他们差不多件件都有，拿来给我看，我说你们搜集的很全嘛！这些书刊运到后，很多同事到我屋看，我自己也差不多都看了，还送给朋友们看。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请求辞职被批准后，即与清华校友阎之翰结伴，拟携眷离兰辗转回平，约定于五月二十一日在西北大厦公路局汽车 station 上车。可是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将行李送车站托运，在西北大厦订好准备住一宵的房间以后，当我准备回去接家眷时，行至云亭碑附近马路西侧人行道，忽然两特务从天而降，一左一右持枪拍着我肩膀说：“请苑先生跟我们走，有事找你谈”我一看，这分明是要逮捕我，便大声和他们吵嚷道：“你们大白天的绑架人，简直无法无天！我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咱到警察局说清楚，叫我去才能去！我那时还认为警察是负责保护人民生命自由的。那两个特务扭着我又走到了西北大厦警察派出所。一进门，特务给警官使了个眼色，便将窗子关上，把我着实地打了一顿，边打边说道，“叫你走你不走，还敢反抗，好大的胆！”随即将我捆绑起来，叫来三辆人力车，拉上直奔铁桥上游黄河沿，到了岸边，给我松了绑，叫来一个羊皮筏子，对我说，“我们一起过河去，你要老老实实的，不然就打死你！”说着就将子弹顶上了膛。过了黄河，来到河北岸庙滩子，又顺着旱沟往上走到一处有兵把守的大门，这就是八战区看守所。开门进去后，特务就把门窗用布遮住，目的大约是不让外边看见。一个特

务大声吼叫着，拿起皮鞭对我又是一顿抽打，直打得我东倒西歪，站立不住。接着将我叫到里屋，把手表、眼镜、皮带以及钱钞留下后，就被关进了看守所的小房子。这期间，由什么“秘书”“干事”审问了我几次，无非就是你这共产党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兰州贩卖共产党的书报，辱骂党国领袖，还不从实招来，不招休想出去，不招你一家永难见面等等。伴随着每次的审问，必然是严刑拷打了。

我被捕后不久，赵麟书也被捕了，还有李宜春大夫及成白竖护士。到七八月间，特务大批捕人，这里一时发生人满为患。看守所多时关押有四五十人，少时则二三十人，还有母亲和小女孩者，一旦审讯，辄动大刑，呼号之声全监皆闻。有一信法刚教授者，听说是北洋大学毕业，在西北农田水利专科学校执教，特务诱他写“悔过书”，他就是不写，说我无罪无过可悔，要放就放，无保可觅。据老犯人讲，这里还关过张学良的秘书。犯人也有解到西安劳动集中营去的，也有乘上山劳动时打死特务后逃走的。坐牢时间有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不等。有一个工人是长征老红军，被抓来已经多年，他很同情被押犯人，经常劝政治犯不要心窄伤心，要乐观多吃，要活下去。狱中生活，初进来时每日放风三次，转到大监后，三顿饭在外边吃，加上有些劳动，就比较活了，犯人间彼此有照顾，我的心情也好多了。但是啥时才被释放，外边有没有人营救，家中情况怎样，都不知道。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才把我和李宜春大夫一并释放出来，总共遭受了二百六十天的无辜迫害。见到爱人和孩子们，真是悲喜交加，不啻从天而降。详谈后方知为营救我出狱，大家都很费心，令我万分感动。爱人告我，被捕后她一时不知所措，经与阎之翰校友研究，肯定了是被特务抓去，进了铁门出来很不容易，他建议我爱人退票，与孩子留在兰州设法营救，这样他们就留了下来，各方托人活动营救。以后几经曲折，始返回了一别十年的故都北平家，得庆团圆，自不免有一番倾诉。至此，这一段历尽艰险的人生旅程总算走过来了。

解放后，我在卫生部工作时，兰州军管会某政委找我谈话时告我，兰州解放前夕，特务们居然把全体在押犯和已释放的政治犯，连同他

们的家属全被活埋了，真是骇人听闻的一笔大血债！那些特务以后全部逃往酒泉，酒泉解放后，他们被一网打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我这里仅向遇难牺牲的难友们表示沉痛的哀悼。今后，我一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人老心不老地继续为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

《囚人望月》之歌鼓舞我前进

李 宜 春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从兰州的兰园卫生事务所下班回家（家住在兰州市工业学校内，因为那时我还兼任着该校校医），途中遇到一个年轻人拦住我说，有一位老师想请我到家出诊看病，家就在北门外。我就跟他出了北门，走到了黄河边。他扬手招来了一个小船，我们先后上了船。此时，这个年轻人凶相毕露，掏出手枪催逼船夫快开船。就这样，我被劫持到庙滩子看守所，哪中统特务关押政治犯的一个秘密地方。

在我被捕的头一天，同事苑毓英工程师突然失踪。当天晚上，我和一些人谈论过此事，我说兰州特务多，人身自由没有保障，谁知第二天就轮到我身上了。在这里，我被关押八个多月。开始，特务们认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地下活动，把我关在一个单人房间，关了一个月。后来，他们知道抓错了，但并不放人，说我是“思想犯”，把我移到一个和十来人同住的大房间中。其实，我在被捕前只不过是有些爱国思想与正义感，在政治上认识是很模糊的。入狱以后，受到了难友们热情帮助，目睹了特务们活生生的法西斯暴行，才使我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他们就是这样地把很多有志青年推到了共产党一边，也就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我喜好音乐，在狱中学会了不少歌。难友张鑫教了我一首名叫《囚人望月》的歌子，歌词全文是：

我记得往日的月亮，
常挂在夏夜的湖上，

微风吹拢着荷香，
船儿在柳梢中荡漾。
但如今，月上高墙，
窥视着铁窗。
我坐在囚人的群里，
弹奏着悲苦的交响。
啊，月亮！
我求你洒光辉照亮牢房，
永远地照着我泪眼，
照亮我心坎的创伤。
啊，月亮！
我不再失望，
等待你，
等待你，
等待你，
黄昏后，带给我们光亮。

据云，此歌为过去一位姓汪的难友所作，词调优美动人，先悲痛而后坚定，最后三个“等待你”婉转起伏，诉出了对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心与对党的殷切盼望。我出狱后遇到困难时，常常默唱此歌，有时也放声大唱，从中吸取督促我勇敢前进、战胜困难的力量。正因如此，我在参加革命后，虽然一直在基层单位做一些平凡的工作，但仍能安心本职，热爱专业，坚持二十多年出全勤。即使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八年下放到苏北的八年多中，当了三年大队赤脚医生，五年多公

社医院医生，尽管在农村一年到头都没有星期天与其他法定假日，但我还是保持了全勤，为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铁 流 滚 滚

李 真

硝烟漠漠染春禾，

铁流滚滚壮志多。

秋风落叶流水去，

红旗飞舞漫山河。

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之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这时，我南下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指向国民党的反革命老巢南京。同时，我各路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向华东、华南、西南、西北挺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人民欢天喜地。

我十九兵团攻克太原后，奉命向西北进军，配合西北野战军歼灭胡马敌军，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乘胜前进 西渡黄河

我师于六月十六日由山西太谷出发，向陕西挺进。路上天气已经炎热起来，中午时分，人们常是汗流浹背，衣衫湿透了，但大家不顾一切疲劳，象长了翅膀，走起来脚底生风。骡马载着山炮和其他辎重，也踏着快步，铁蹄声和着鞍架发出的音响，有节奏地欢唱着。我们夜宿晓行，走了十二天，于二十八日到达禹门口。

来到黄河边时，码头上停着一排排木船，战士们一队队地陆续开

到河边。整个码头上人来人往，忙个不停。河滩上，人欢马叫，红旗飘舞。来欢迎欢送和看热闹的群众，络绎不绝，一拨去了又来一拨，真是人如潮，旗如海。

船老大们热情地站立在船头，有的张帆，有的握橹，有的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舢板。排列在河滩上等着上船的部队，到处飞扬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看到这种情形，我们都心里喜洋洋、脸上笑咪咪的。我这是第二次过黄河，眼前情景，使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上次过黄河，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我们开赴抗日前线，也是在这里渡河的。那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处在危急关头，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风起云涌般的抗日救国运动。而这次西进，目的却在解放全中国。仅隔十二年的时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起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我们师的领导同志分别检查了第一批登船梯队的各项工作，我和警卫员又来到河滩上。这时候，天近傍晚，夕阳斜照的河岸，不时掠过一团团洁白的浮云，河上游吹来阵阵凉爽的晚风。警卫员指着一片飞云说：“看，就好象咱们那匹枣红色骏马。”不，不是一匹，而是许多，他们一齐向西飘浮，宛如雄壮的骑兵，向敌人背后迂回奔驰。

“政委，咱们的船快开了，上船吧！”辛明喜轻轻地叫了一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和遐想。

扶眉传捷 陇东追击

我华北兵团（十九兵团）陆续进入陕西省境，胡（胡宗南）马（马步芳、马鸿逵）敌军向西安反扑未逞，遂向长武、邠县地区收缩。胡军主力集结于扶风、眉县一线，宁夏马军集结于邠县、永寿地区，青海马步芳的部队撤至长武、邠县一带。敌人这副架势，一方面是企图阻止我向西北疾进，同时也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即以逸待劳，诱我军向胡宗南部出击，而后马军向我侧击，如果我指向马军，胡军就从侧翼夹击我军。胡宗南还在作着黄粱美梦呢！

我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决心是：十九兵团牵制两马，主力大部投入歼灭胡军的战斗，得手后再歼灭马家军。

我师奉命由倒贤镇出发，七月十七日进至三原西北地区，阻击沿泾川河东窜之敌，以保证兵团主力侧后的安全。接到命令后，人不歇脚，马不停蹄，部队很快进到淳化县口头镇西北一线高地，日夜忙于构筑工事。刚把工事修好，就传来了捷报：扶眉战役歼敌四个师，四万三千多人。这时，退守永寿、眉县一线的两马军队，也被我泾川以西兵团主力击溃了。短短数日，战役进展得如此迅速，十分鼓舞人心，战局的迅猛变化，确有一泄千里之势。因为扶眉战役的胜利，我军已控制了秦岭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割断了胡马两军的联系，造成了有利于我追歼青、宁马军和解放兰州、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有利条件。

我第一、第二和第十八兵团在扶眉地区歼灭了胡宗南部主力之后，青宁两马向泾川、崇信、陇县地区紧密靠拢，企图依托华家岭、六盘山一线山地凭险据守，进行顽抗。为迅速歼灭青、宁两支马军，根据命令，不放过敌人喘息机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发起了陇东战役。十九兵团为右翼，沿西兰公路两侧向长武、泾川地区进发；第一、二兵团为左翼，向陇县、华亭攻击；第十八兵团在西安、宝鸡一线，阻击胡宗南的可能增援。

七月二十一日，我师由口头镇出发，骑兵第二旅也配属我师，沿泾川河北岸，向旬邑、宁县、镇原西进，保障兵团主力右侧翼。这时，我们师的几个负责同志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追赶敌人，稍事休息时，则在地图上画线、画圈、画点。当我部队追到敌人集结点时，那里的敌人早已狼狈逃窜了。许多干部、战士怕打不上仗，有的甚至埋怨上级领导不给部队主要的战斗任务，不给杀敌立功的机会。

盛暑季节，部队在似火的炎阳中前进，在水源奇缺的高原或沟深水苦的地区前进，有时在滂沱大雨中前进。太阳晒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口干得喉咙似火烧，宿营后找水做饭成了一件大难事，炊事员们既着

急又辛苦。而有时突然山洪一来，卷走了我们的战士，冲翻了驮炮的骡马，救起之后，又继续追赶部队了。在这些困难面前，没有孬种，没有稀泥软蛋的，没有掉队开小差的，一个个勇猛异常，信心百倍。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不怕苦，不怕难，追歼胡马军。解放大西北！”

当得悉宁县敌人一个大队正准备西渡马莲河逃窜时，我五六三团冒雨急进，强渡洪水滚滚的马莲河，迅速包围宁县城，随时猛烈攻击守城之敌。敌人虽有较强的土木工事和严密的火力配备系统，但它处于孤立无援、士气沮丧的境地，城垣很快被我突破，守敌全歼。

宁县战斗结束后，五六二团三十一日解放了镇原县城，兵团主力也解放了平凉。这时，宁夏马鸿逵主力怕我围歼，遂向任山河、固原方向逃窜。我师和骑二旅冒雨从镇原地区出发，不顾山路泥泞，一天急行军一百五十里，于八月一日赶到任山河地区，配合第六十四军拦歼该敌。当我到达围歼地区时，宁马第十一军和马惇靖军部分被我第六十四军围歼外，余敌则利用地形熟悉和骑兵行动快的特点，逃之夭夭了。

在陇东追击战中，连续行军七百里。由于敌人害怕被歼，便采取有计划的撤退，仍图保存主力，依托兰州坚城消耗我有生力量，然后与我决战。所以陇东追击战至八月十日止，我西北各兵团解放了陇县、平凉、固原、天水等广大地区，准备投入新的战役。

八月九日，我师由固原任山河地区出发，翻越六盘山，十三日占领了西吉。

六盘山，多么壮观啊！我站在山巅，极目向四周远望，起伏连绵的山浪，沸腾着我的胸膛。它是当年万里长征的里程碑。毛主席用高瞻远瞩的目光，眺望着万里长空，赞颂这支战无不胜的铁军，只要长缨在手，就不怕缚不住苍龙。昨日的无数好汉，今日仍然是缚苍龙的英雄。听，这是多么壮怀激烈的歌声！看，这是多么沁人肺腑的史诗啊！现在，在眼前展现出的这幅壮丽图景，能不使人感慨万分、心花怒放吗？！我为再过六盘山填了一首《清平乐》拙词：

六盘高处，
劲松拂晨雾。
残叶零乱入泥污，
瘦马楞眸无语。
昔扫赣江乌云，
今靖方里妖氛。
才向长城跃马，
扬鞭又指金城。

大战兰州获胜 黄河滩头受降

我军越过六盘山，继续西进，为砸开西北大门，发起了解放兰州的战役。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所在地，也是历史上通往河西走廊、新疆及到国外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扼制青海、宁夏的喉管，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兰州城北依黄河，东南面群山起伏，陡险处岩石如剑插云霄，成为天然屏障。抗战期间，这里修筑了所谓“国防工事”。解放战争中，特别是由于我西北大军取得节节胜利，胡马敌军为达到保住西北一隅的目的，把整个兰州修筑成以碉堡为核心的“固若金汤”的地区，并以环山公路相连。马家军还以封建落后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官兵进行欺骗教育，灌输对我军的盲目仇视，并把从穷苦群众中搜刮到的金银，大量散发给官兵，以收买军心，为其卖命。青海马军首领们凭借这些，对我军进行顽固抵抗，作垂死挣扎。

为集中兵力，我军必须首先歼灭青海的马家军。上级命令第十八

兵团在水、宝鸡一线牵制胡宗南部，第六十四军在固原一线拦击宁夏马鸿逵部，以第一兵团消灭兰州以南之临洮、临夏之敌，尔后直取西宁，截断马步芳退路，由第二、第十九兵团（欠六十四军）攻取兰州城。战役部署确定后，我各路人马运载着大炮，浩浩荡荡直扑目的地。一路之上，翻山越岭，攻城破寨，势不可当。

八月中旬，我师进至甘肃省的会宁城，与军主力会合。作为兵团和军主力右翼的保障，从陕西淳化口头镇出发到会宁，四十多天在前线执行行军作战的任务中，广大指战员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现在会合了，他们都很高兴。

会宁，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地名啊！它曾经在红军战士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就是在会宁会师的。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我在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基层工作，知道的事情很少，但是，走过的路程却记忆犹新。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翻越过无数的高山峻岭，渡过了无数的急流险滩，草鞋破了，赤脚走，肚子饿了，用苞米野菜充饥。在夏日炎炎时，浑身汗水淋淋，冬天寒风刺骨，身上却只有单薄褴褛的衣衫。可是人人有一颗火热的心，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在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里，面对着敌人的前堵后追，有时打罢仗就走，患了病就抱病行军，负了伤的跟着走，重伤抬着走，万一无法抬时，就寄养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就这样，即使很苦很累，这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围攻和堵截，用鲜血为会师铺平了道路。会师了，我们见到一方面军来迎接的战友，真是悲喜交加，有的高兴地拥抱着，有的狂热的跳跃着，眼睛里止不住地淌着热泪。宣传队员们纵情地欢唱，尽情地跳跃。有些同志用河里的清水当酒，猜拳碰杯，一阵痛饮。……

想过去的会师，看看今天的会合，都是在会宁城，然而革命形势起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大家都欢呼这一伟大胜利的变化。是的，中国人民经过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下，正迎接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最后胜利。

会合后，部队迎着无数面高举在前头的红旗，朝兰州近郊的定远镇进发。这里临近黄河，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也是梨香瓜甜的地方。一路上，支援前线的各族人民，组织起来的担架队、平车队，在我们身旁匆匆走过，脸上浮现着笑容，脚板特别有劲。牧民们唱着悠扬的牧歌，不少回民、藏民骑着马，载着烧熟的全羊，驮着酥油、糌粑，老远的赶来，站在道路两旁，欢迎解放军，赠送慰劳品。当我们走进宿营地时，清真寺、喇嘛寺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向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致敬！”“解放兰州，人民见天日！”的大幅标语。指战员们目睹这一切，完全忘记了几个月追击战中的疲劳，激发了更高昂的斗志。

兰州战役，经过短促的准备，于八月二十二日九时发起攻击。我第六十三军奉命夺取工事异常坚固的十里山和窦家山，尔后协同主力攻入兰州。此次战斗，我师为军的预备队。

在突入敌阵地时，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白刃格斗，敌人连续疯狂地进行反扑，我攻击未能奏效。这一方面是准备不够充分，对长途追击仓皇撤退之敌产生了轻敌思想；另一方面对敌人坚固工事缺乏详细侦察，尤其是没有认真研究青马军战术技术的特点。经过十里山战斗的总结，进一步做了充分准备，于八月二十五日在野司统一号令下，对敌发起总攻。在我各路大军勇猛攻击下，敌不能支，于黄昏时全线溃退，我师迅速投入追击。二十六日拂晓，我第二兵团第三军攻占了兰州西关，控制了黄河铁桥，完全切断了敌人的逃路。我师和一八七师也追至兰州东关。敌人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人马相互践踏，争相逃命，有些在我堵击下，仓皇跳入黄河，妄图泅水逃脱，结果大部溺死水中。战斗至中午完全结束，共歼敌四万余人，兰州即告解放。我师奉命进入兰州北关待命。

驻在黄河岸边，每天早晨，当部队在河滩上出操上课时，教练们的哨音及口令声，和着战士们的喊声，声浪滚滚，威震群峰，山岳似

乎在撼动，奔腾的黄河也为之屏声敛息。这气壮山河的声音，是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乐章。部队收操后，我乘兴在河堤上散步，有时去瓜地果林走走，望着那群山拥抱着河川，瓜果地里飘来一阵阵的清香，宛如美酒醉人；部滔滔不息的黄河，绚丽多姿的浪花，好似胜利的火焰在绽放。此情此景，激动得我思绪万千。多少年来，这支人民军队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走着，越走道路越宽广。想一想我们走过的道路，哪一条不是从崎岖小道上起步的？哪一条不是从悬崖绝壁上开始攀缘的？而今广大城镇绝大部分解放了，可它得来不易啊！这支队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胜利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好比万山丛林中的溪流，经过无数的弯曲拦截，如今汇成了象眼前的黄河，奔腾咆哮，所向无敌。再看看附近的村庄，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鲜艳的小旗在风中飘动，兰州人民心花怒放了。是呀，他们日日夜夜盼望着解放，如今实现了，该多么高兴啊！而且，千万张笑脸相迎，这也意味着我军战士的优良作风，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深根。

在短短的休息中，战士们要求去解放宁夏的求战书，象雪片一样飞来。

九月七日，我师由兰州北关出发，沿黄河东进。为夹击两岸的宁夏马家军，决定以五六三团沿黄河北岸开进，师主力则沿黄河南岸进发。我和张挺师长带前进指挥所并率五六四团一营乘皮筏和木船，顺黄河水流东进。

黄河，在万丈高峻的石壁峡谷中汹涌奔流。据老一辈船工们讲，从兰州到宁夏的中卫，要经过许多暗礁险滩，特别是靖远到五佛寺这一段行船十分危险，在红山峡到黑山峡之间，有几道“鬼门关”，还有什么“猛虎张嘴”、“七姐妹”、“鳄鱼口”。这些都是急湾中横卧和尖立的礁石，它曾经残害和吞噬了许多穷困船夫的生命，使妻子当了寡妇，儿女孤苦零仃。许多人讲到这一段的行船，大有谈虎色变之感。尽管这样，我们在沿河还是找到了几位熟悉水性的船老大，他们热情地支援了我们。而我们为了迅速插入中卫，断敌退路，也就顾不得这

些了。

顺着河道，羊皮筏在波涛中忽上忽下，在旋涡中翻滚旋转。当遇到险滩时，船和皮筏象掉在深渊，浑浊的高浪冲击着，人们象在摇篮中东倒西斜。突然，那只大木船和礁石相撞，碗口大的破洞瞬即进了水。警卫班的同志们用背包堵，堵不住，一个战士干脆用身子贴在破洞上，几个人顶着，船老大把船摆渡到比较安全的浅水地方，才解救了危急。

五六三团进军途中所遇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了。他们经过的地区，最困难的就是当地老乡说的“穷四站”和著名的腾格里大沙漠。后来我才知道，这支部队在沙漠里行军的艰苦程度真难以想象，他们一脚下去，流沙把脚埋住了，鞋子灌满了黄沙，拔出这只脚，那只又被埋得很深，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而又坚定地向前走着。肩上的枪被晒得滚烫，只好不时地左右移动，不一会两条腿如坠千斤石似的挪不动了。晌午，经过太阳的照射，沙地里如喷烈火，烧得滚烫，既无风又无云，人象装进蒸笼里，难受极了。带的水喝干了，汗珠一串串地在沙丘上滴印出无数的小坑，而小坑立刻又被流沙淹没了。

在沙漠中行军固然很艰难，但一想到兜敌人的屁股，战士们无不劲头十足，鼓动口号一路不绝：“打到宁夏去，消灭马家军！”“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战胜沙漠！”

走着，走着，太阳突然躲进黄沙里去了，顿时昏天黑地。从远处刮来的大黄风，卷着沙石奔腾着，呼啸着，刮得天空象要塌下来似的。地上的沙石，打在人的脸上十分疼痛，眼睛睁不开，衣服被吹得象气球，脚一动，人就好象断线的风筝要刮到空中去。开始，有的战士见别人刮出队伍行列，还笑着喊：“再放一个风筝！”话音刚落，自己也被刮出了行列，引起大家一阵哄笑。风越刮越大，有时还夹着一阵冰雹，路更难走了。晚上，风住了，沙漠平静了，酷热也随之消失，而严寒又猛烈地袭来，部队就露宿在沙地里，半夜严寒把人们冻醒，牙齿打得格格响。但这些都难不住战士们飞快断敌退路脚步。

在沙漠里走了几天，时间虽不算长，而对这支部队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战士们不是考虑酷热、严寒、口渴等各种艰难困苦，而是心里装着还在马家军统治下受着煎熬的人民，想着肩负追歼逃敌的任务，于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他们忘记了饥渴和疲劳，快跑快追，每个人都恨不得生出翅膀，一下子飞到中卫城。

部队在艰苦行军中，沿途散匪土顽纷纷向我投降。十四日进至景泰以西小芦塘时，敌新编骑十五旅由旅长张钦武率领全部人马向我军主力投降。十五日进至五佛寺地区，得悉我军主力于中卫黄河对岸之常乐堡歼敌一个团，同时我第六十四军已占领同心城，逼近中宁。原来企图与我决战之宁马第八十一军马惇靖，见我大军临头，抵抗无望，再加军心动摇，无力再战，遂派代表与我军接洽和平解决。二十日我师逼近中卫，当日马惇靖就签字接受和平解放的条件。紧接着，二十三日敌各军军长、师长联名向我军接洽，并以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当日于中宁签字。这时，驻大坝、小坝、银川之贺兰军及十一军残部自行溃散，连卢忠良签字后亦不敢返部，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于黑夜逃来我军请求保护，马鸿宾也一再请求我军派部队进入银川维持秩序。我六十四军一部遂于二十三日开进银川市，宁夏宣告解放。

在历时三个半月的行军作战中，我们走了三千六百五十余华里的路程，甘肃、宁夏广大地区的人民从苦难深渊中解放出来，重见了天日。

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心中总是难以平静下来。这里，我抄录一九四九年作的《沁园春》拙词一首，作为这段历史的结尾：

号咽连营，
战马嘶鸣，
招展红旗。
胡马城池弃，

街头醉酒，
掠人良妻，
败将如泥。
羌笛无声，
膻腥千里，
西域残焰狐鬼迷。
争驰骋，
昼夜追蛇鳞，
丝路轻骑。

任它风雪低迷，
我排山倒海向天衢。
过雪山草地，
北上抗日；
万重关锁，
天水疏篱。
冲破危机，
成城众志，
群鸦鼓噪枉悲啼。
披衣起，
看十四年后，
花迎晨曦。

解放兰州的一则消息

苑 毓 英

一九五一年清华校友卢守珪来京开会，闲谈中告诉我兰州解放时的一则消息，追记如下：

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临解放时，市内非常混乱，国民党反动派撤退的军队和器械，挤满了通往黄河铁桥的桥门街，人声嘈杂，军无斗志。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化了装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携带手枪越过五泉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从宗棠门（解放后改为解放门）进城直奔萃英门（在今临夏路），来到了兰州电厂最早的老电厂旧址。当时此处是兰州电厂的仓库，为勘测队所占，留守之人就是卢守珪之表弟。解放军敲开门后对他说，这里有一穿城门，希望由此通过直插黄河桥，拦腰截断溃退之敌，迅速解放兰州，请你引导将门打开，为人民立功。卢兄表弟喜出望外，多日盼望的解放军终于到了，他急忙将战士们请入，拿上钥匙打开了双扇铁门。于是战士们鱼贯通过，转瞬间占领了黄河铁桥，鸣枪宣告退路已截断，要敌军缴械投降，紧跟着正面推进的大军也在不久到达，兰州就这样避免了更大战火的摧残而宣告解放了。卢之表弟为此还受到解放军司令部的嘉奖，为人民立了一功。

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

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

张 达 志

自从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北红军和创建苏区之后不久，特委就遭到了破坏，两位特委委员及四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另外两位特委委员不辞而别去了北京，党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但是，革命者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为了继续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特委尚存的几位领导和各地党团组织负责同志率领广大群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使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如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以及安塞、延长等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发展了红军游击队，创建了苏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了赤卫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同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为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敌人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在谢子长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在红二十六军的积极支援配合下，于一九三四年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在我们赢得反围剿胜利之后，紧接着敌人对陕北苏区又部署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面对这一严重形势，陕北特委立即组织广大军民奋起还击敌人这一更为猖獗的进攻。陕北人民和陕甘、陕北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经过九个多月艰苦英勇的战斗，终于又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五年秋，敌人对陕北和陕甘苏区又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西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经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初步取得了

反围剿的胜利。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一军团、十五军团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直罗镇敌牛元峰一个师又一个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一）

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简要经过情况如下。

第一，敌人围剿红军的部署。

在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我陕北苏区红军游击队更迅速地发展了，苏维埃政权都已建立起来，苏区更加巩固扩大。土豪劣绅大都被铲除，未被铲除者，都已逃到县城内。土地都已分配给贫苦农民了，土豪劣绅不敢向群众任意收租要税了。这样就直接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国民党独裁统治者蒋介石鉴于他历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企图扑灭陕北红军于星火之中，故动员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围剿陕甘、陕北两苏区和红军游击队。陕西省杨虎城部进到洛川、富县、甘泉、宜川、黄陵一线；甘肃省敌人进至正宁、宁县一线；宁夏之敌马鸿逵部进至陇东曲子、合水、环县、庆阳一线，围剿陕甘红军和苏区。蒋介石知道，在陕北苏区光靠原土皇帝井岳秀围剿红军已不可能，所以从河北省平定县又调高桂滋部八十四师，于一九三三年秋冬经吴堡宋家川到陕北，协同井岳秀部“剿共”。

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点是陕北苏区。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下辖两个旅，一个旅为高双城旅，一个旅为刘润民旅，师部驻榆林城，其部下分驻在佳县、米脂、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保安等县一带，重点围剿神府和佳县南北苏区。井岳秀认为，高桂滋部队来到陕北，增添了围剿红军游击队的反革命力量，把自己部队收缩在小范围内，战线缩短了，力量集中了，自己的军队在陕北多年，人地熟悉，可以不必费力地就能消灭掉红军游击队。

高桂滋八十四师下辖两个旅，一个为刘旅，一个为高旅，师部驻

绥德城，其部下分驻于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子长（安定）、延安、安塞等县一带，重点是围剿吴堡、安定、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苏区。高桂滋进到陕北后，一时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陕北人，又有装备精良的军队，陕北红军都是些当地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游击队消灭掉。井岳秀和高桂滋的部队星罗棋布地分驻在苏区内中心要地，修堡垒，并村庄，办保甲，练乡勇，利用极少数叛徒成立“肃反委员会”，组织“铲共义勇队”，把老百姓都强迫转移到敌人驻扎的堡垒内，企图把贫苦农民和红军游击队分开，割断群众对游击队的支援。同时，敌人又以连或营为单位，带上土豪劣绅，天天轮番四出清剿，烧杀群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游击队受到围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惨遭屠杀，广大群众蒙受着白色恐怖的迫害，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

第二，我反围剿之准备。

一、组织准备：

1. 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刘志丹同志从陕甘苏区调到陕北苏区主持军委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和陕北两个苏区的武装力量。（谢子长同志于一九三四年秋打河口时负重伤，一九三五年二月不幸逝世）

2. 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一九三二年二月在高朗亭、刘善本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在延川县永坪镇创建了陕北第一支工农红军武装（即第九支队），以后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

自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到一九三四年底，先后在清涧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神府苏区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在吴堡创建了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在绥德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六支队，在米脂西区、横山等地区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

在延川、延长、延安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一九三四年秋，安定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组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同志，政委马佩勋同志。

陕北红军力量，从特委扩大会议后有了很大发展，改编为正规红军已具备了条件，所以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同志，政委张达志同志，参谋长朱子修同志。该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原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团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兼任，副团长路文易；原清涧游击队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团，团长郭玉仁，政委马万里；原神府游击队第三支队改编为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上述三个游击队整编为红军一、二、三团后，又在安定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神府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

3.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便使各地游击队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同志下令把各地游击队按作战区域统一整编为游击纵队。如米脂西区、横山区域成立了游击纵队，由谢绍安负责。佳（县）吴（堡）成立了游击纵队，调原红二团团团长郭玉仁同志为司令员，王再兴同志为政委。其他各地区亦相继整编成立了游击纵队。

4. 抓紧时机训练赤卫队领导骨干。为了在反围剿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对各地赤卫队队长进行一次短期轮训，时间十余天，每期三、四十人。刘志丹同志不仅亲自召集主持，而且亲自上课上操，讲解游击战术，操练手中武器，讲解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讲解红军赤卫队必须遵循的纪律等，动员大家回去后带领赤卫队在反围剿斗争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二、思想准备：

1. 为了赢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工委特向苏区军民发出指

示，号召广大党团员、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坚壁清野，镇压反水的土豪劣绅，袭扰和打击零星出来抢劫群众财物的白军，掩护群众转移，配合红军消灭敌人，并号召大家向敌军宣传我党的政策，揭露敌军虐待士兵的罪行，宣传红军官兵平等，以瓦解敌军。

2. 刘志丹同志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苏区军民发布了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动员令。这个动员令是志丹同志亲自起草的，写得很好，言简意赅，对当时的反围剿斗争产生了巨大的鼓舞推动作用。可惜这个文件未能保存下来。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阐明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和必胜条件，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等等。这个动员令分发到各个红军、各个游击队、各赤卫队和各地党政团群众组织进行宣读讨论，并订出具体打击敌人的措施，真正起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作用。

三、物资准备：

1. 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保存好粮食和衣物，还要保存好公粮，以备红军打仗、休整之用。

2. 动员妇女积极做军鞋，以供红军之需。

四、红军武装力量的部署：

为了集中红军主力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刘志丹同志下令调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王世泰同志为团长，这个团是红二十六军主力团，战斗力很强）和义勇军（郭宝珊同志为司令员）到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合，协同作战，并统一由刘志丹同志指挥。

第三，选定主要打击对象，制定作战计划。当时蒋介石动员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围剿，虽然是针对陕甘、陕北两个苏区但其重点又是以围剿陕北苏区为主的。所以，首先打击和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是关系到整个西北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围剿陕北苏区之敌为井岳秀、高桂滋两部。在这两个军阀之间首先应选择哪个为主要打击对象呢？刘志丹同志对井、高两部谁个优劣、谁个强弱以及他们对我

危害程度作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首先应集中兵力打击高桂滋部。其理由是：

一、高桂滋部围剿的重点是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一带，而这些地区正是我陕北苏区腹地，也是我党政工作以及指导和联系各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因而粉碎敌人对这个地区的围剿，对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陕北苏区与陕甘苏区，使之联成一片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二、高桂滋部刚到陕北，人地两生，对陕北地理风俗和社情都不熟悉，而且他的士兵又都是冀鲁豫人，不会爬山，不适应在陕北这多山之地作战。而我军则是土生土长在陕北，对于地形民情了如指掌，更主要的是和当地群众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

三、高桂滋部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轻重武器、长短枪支都是进口的。而井岳秀部的装备却是土造的过时的老式枪支，弹药，又很短缺。所以集中兵力消灭高桂滋部，对于补充和改善我军武器装备都是十分有利的。

四、高桂滋部刚到陕北，未同红军打过仗，不了解我军作战规律，没有吃过苦头，凭其装备精良，人员充足，又自认为是正规军，因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根本不把红军游击队看在眼里，以为游击队既无好枪，装备又差，况且又是些缺乏军事素养的老百姓，不堪一击，骄傲得不得了。古语说得好，骄兵必败。我们决定首先向他开刀，也正是看准了高桂滋部的这一弱点。

五、高桂滋与井岳秀两军阀对攻打红军围剿苏区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高桂滋原是井岳秀部下的一个连长，以后脱离井岳秀而投靠了蒋介石，发展成为一个师。因为高是陕北定边人，一心想赶走井岳秀，独占陕北为王。井岳秀本不愿让高桂滋部开来陕北，惟恐打完红军后高赖着不走，侵占他的地盘。既然高桂滋受命于蒋介石来到陕北围剿红军，那么井岳秀只好哑巴吃黄连，时刻提防着高桂滋部的行动。他们俩的矛盾是很深的，互不服气，互不支援。

这样一来，便使我军有隙可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实践证明，我军选定这个主要打击对象是完全正确的。

反围剿的主要打击对象确定之后，随即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先消灭分散驻在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中心苏区内的孤立之敌，其打法是采取调虎离山、诱敌出笼，在运动中打击消灭敌人或采取伏击办法歼灭之；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向苏区外奔袭奇袭，打击敌守备薄弱孤立据点和城镇，力争与陕甘苏区联成一片。口号是红五月打通陕甘苏区通道，夺取反围剿的更大胜利。

第四，反围剿的几次战例。

1. 南沟岔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时，革命形势正处于敌人第二次围剿开始之际。成立后不久，便于同年十二月在安定县南沟岔打了第一个胜仗。这是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的第一仗，消灭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连。这个连是高桂滋部深入安定苏区的一个前哨连，是围剿这一带苏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每天四出清剿，骄横异常，一闻有游击队活动，即疯狂追打。尽管当时红军刚刚成立，武器装备较差，枪支弹药缺乏，但我军指战员斗志高昂，加之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善于用己之长，克敌之短，所以抓住敌人易于诱出一弱点，采取伏击打击敌人。战斗之前，我军事先将部队隐蔽集结在南沟岔两侧，然后派游击队、赤卫队把敌诱出，使之脱离碉堡。不出所料，果然敌人被我诱出，并很快进入埋伏圈内。于是，我军一部从正面攻击，一部侧击，断敌后路，四面包围。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便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不仅俘敌七、八十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还有其他装备弹药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表现了我军指战员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如红一团有个班长，叫李富贵，在一个小山堡上与几个敌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连一粒子弹也没有了，他就急中生智，用手猛向敌人扬土，趁着对方看不见之际，猛扑过去，夺过敌人枪支，消灭了这个

山堡之敌。这一仗，我军伤亡很小，却取得全歼敌一个加强连的胜利，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士气。从此，敌人龟缩在南沟岔以东一带，再不敢随意向我苏区进犯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苏区军民斗争情绪，人心一安定了，苏区巩固了，特别是用缴获敌人的大量枪支弹药补充了我军，更增强了我军的作战威为。南沟岔战斗结束后，部队即时转移至玉家湾一带休整，决定乘胜转至清涧苏区打击敌人。

二、清涧高杰村战斗。

高杰村位于清涧县苏区中心，是个大村子，党团员多，革命同志多，但反革命分子也不少，敌我双方斗争很尖锐。敌人为了围剿清涧苏区，在这个村子驻扎了高桂滋部的一个连。这连白军，猖狂得很，每天四出搜剿，使红军游击队无法活动，革命工作无法展开，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清涧苏区。

我军南沟岔战斗结束后不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即隐蔽转移到清涧苏区阎王砭一带。为了彻底打破敌人对清涧苏区的进攻，特派清涧游击队第二支队和赤卫队前去高杰村诱敌出来，而将我主力部队则事先埋伏在阎王砭两侧，等待敌人深入我埋伏圈内一举歼灭。果然，敌被我诱至事先布置的伏击圈内，随之我军四面合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了留在高杰村少数守敌外，干脆利落地把敌人一个连全部歼灭。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少（只是二支队队长惠世良同志牺牲了），却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驻在清涧苏区之敌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再随意出来活动，我苏区军民士气大振。高杰村守敌撤走后，东区苏区又有了大的发展。

三、贺家湾战斗。

打罢高杰村之敌后，我军准备转移到安定县寻机再战。当途经贺家湾附近村子时，侦察员和地方同志获得清涧一连敌人正向延川驻敌

护送军饷的消息。因为贺家湾村乃是清涧到延川必经之道，又是我苏区，该村依山傍沟，地形对我极为有利。于是，我军即隐蔽在该村附近等待。时隔不久，敌人果然偷偷摸摸进了村子，我军一声令下，随即四面进攻，不到两小时功夫，便将敌人全部消灭，击毙敌连长一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所送全部军饷（两千多块白洋）。这次战斗，红二团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政委李宗贵（现名李赤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战斗中头部负了重伤。

四、横山县寺儿沟战斗

这次战斗，是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接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同志命令，北上陕北准备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途中打的一次歼灭战。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四月初，陕甘苏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政委张秀山同志率领红三团、义勇军北上到达陕北。他们来到陕北时，为了迎接两苏区红军会师，首先在横山县的寺儿沟全歼敌井岳秀部一个连。

我们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指战员得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已北上到达安定西区白庙岔一带并打了一个胜仗的消息后，十分高兴，随即向安定西区前进，于白庙岔附近会师。这时，刘志丹同志也来了，他召集两部红军的领导同志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上，志丹同志简要地讲了会师的意义，强调指出增强团结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要性。两军会合后转移至冯家稍塬，就地开了个军民联欢大会，附近的群众都送来了慰劳品，有送猪的，送羊的，送鸡的，欢天喜地庆祝两部红军的会合。刘志丹同志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虽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他要求两部红军团结一致，在西北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鼓足勇气，多打胜仗，多打大仗，在红五月中把陕北苏区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以彻底粉碎敌人

的第二次围剿。刘志丹同志的讲话，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五、吴家寨子、杨家园子、马家坪战斗。

红二十六军老三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于四月在白庙岔会师之后，统一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指挥。随后他亲自率领全体指战员隐蔽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地区栾家坪一带，准备把瓦窑堡之敌诱出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可是，敌人受了前几次吃亏的教训，怎么也不肯出来。所以，预定在这里消灭敌人之计划便未得实现。此后，又转移至玉家湾一带集结待命。这时，志丹同志接到瓦窑堡地下党和我侦察部队的确实情报说，敌高桂滋部驻瓦窑堡李少堂团的一个连将押送我党党员赵通儒去清涧，并且有杨家园子之敌一个连接应。刘志丹同志随即召集两部红军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红一团由玉家湾出发直插吴家寨子，将瓦窑堡出来之敌给以歼灭；刘志丹同志带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二团及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由杨家园子向吴家寨子前进，迎击吴家寨子以东地区之敌人。在我准备发起进攻时，却观察到敌人已抢先占领了南山一带，并正在构筑工事。考虑这样出击不利，就又退回原处伺机再打。此时，由贺晋年同志带领的红一团已在吴家寨子同瓦窑堡出来之敌打响了。由于他们作战英勇，猛打猛冲，遂将一连敌人打垮，追至瓦窑堡数里之外地方，一举歼灭该敌，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俘敌数十人。这时，吴家寨子以东一营之敌听说瓦窑堡出来的一个连被我歼灭，企图增援，随之脱离阵地，迅速向吴家寨子前进，也被我红一团当头一打，敌即抢先向吴家寨子东山一带高地运动。正在待命的我军指战员得知红一团已把瓦窑堡一连之敌全歼，吴家寨子村对面高山敌人正在爬占高地，大家高兴极了，纷纷要求进攻吴家寨子东山之敌。刘志丹同志考虑这是歼敌的很好战机，于是当机立断，亲自指挥，命令红二十六军老三团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从正面向敌攻击，义勇军、八十四师二团从敌侧后攻击，各山头赤卫队鸣炮助威，密切配合。就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冲杀，激烈战斗，终于将敌全部歼灭，俘敌二三百人，重伤敌营长一名，缴获甚多。战斗结束后，为了瓦解敌人，我们正确执行了俘虏政策，对被俘官兵

进行了宣传教育，告诉他们：愿当红军者欢迎；愿回家者发足路费遣送回家；愿再去当白军者，也可以，但再与红军打仗时，枪口要朝上，不得打准人；如果向红军缴械者，还可以得到赏洋。对有技术的机枪射手和医生，也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留下使用，使之改造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各部队随即进至玉家湾一带休整，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西北工委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郭洪涛同志等前来参加，刘志丹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正式宣布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张达志同志为党务委员会书记。当晚还开了一次西北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今后军事行动等重要问题。

此时已陆续接到赤卫队、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同志报告，得知我九支队、赤卫队把从绥德经由清涧向瓦窑堡驻敌李绍堂部护送军饷、被服装备的敌一个营即四个连以及驮运东西的骡马队，在马家坪子附近四面包围，敌人困守山上，不敢妄动，水喝不上，饭吃不上，十分恐慌，要求主力红军速去消灭该敌。刘志丹同志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向马家坪进发。一到马家坪村后山上，首先观察了地形，了解了敌人兵力部署，随即命令各部队四面包围敌人，勇猛冲杀。我军具体部署是：一部分对驻在对面山上之敌攻击，一部分向马家坪村敌人攻击，一部分在马家坪退路堵击敌人。由于我主力红军和游击队英勇奋战，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营敌人，俘虏敌官兵几百人，骡子二百多头，机枪、八二迫击炮和医药物资甚多，还俘获了李绍堂和其他几个军官的太太数人。战斗结束后，部队随即在马家坪就地休息。我们同刘志丹同志都睡在院子里，而把窑洞腾出让给俘虏们住，特别是优待了几个被俘的官太太。为了避免意外，刘志丹同志还派了少共先锋连战士放哨警戒。而将军用战利品装备了部队，被服分发战士，其他重要物资以及被俘的医生、几个官太太统统送往后方，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处理。

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是我两部红军会师后在刘志丹同志亲自指挥下，仅在三天之内取得的。两次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清涧、

瓦窑堡两城之敌在我游击队、赤卫队层层包围之下，处手极端孤立的地位。由于红军的胜利，我军民士气更加高涨，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土枪土炮变成了洋枪洋炮，红军扩大了，游击队发展了，苏区进一步巩固发展了。实践证明，只要把主力集中起来，形成有力的拳头，在刘志丹同志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在苏区人民积极支援下，尽管敌人装备优于红军，但还是可以被我们打败的。

六、张家圪台村战斗。

在安定杨家园子、马家坪村两次战斗后，志丹同志决定向绥德苏区转移，寻找机会打击该地区之敌。此时，吴堡县游击队在该县县委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歼灭很多敌人，游击队随即扩大改编为红军第五团，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南下到清涧与主力红军会合，正式整编成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团（原神府三团仍然称为神府红军第三团），团长王士文，政委王国昌。这个团战斗力较强，射击技术比较准确，给主力红军又增加了一支力量。

部队转移到绥德之后，打算打击驻在绥德、清涧地区重点据点定仙塬之敌，因为该地敌人严密控制着我吴堡、绥德、清涧苏区交通要道，对我危害极大，所以决定首先拔除该据点顽固守敌。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志丹同志还不放心，亲自带领红军领导同志摸到敌据点附近，观察地形，发现敌阵地居高临下，工事坚固，攻击不易成功。因而临时决定暂时放弃攻打定仙塬之敌，返回清涧学务村一带休整，然后向张家圪台之敌攻击。正在这时，当地群众纷纷来到指挥部，要求红军一定消灭了定仙的守敌后再走。刘志丹同志为了安定民心，要我当晚向群众讲一次话，说明我军决不辜负群众期望，虽然暂时放弃攻打定仙塬之敌，但一定要打个胜仗来报答乡亲们的期望之情。

张家圪台村驻敌高桂滋部虽只一连，但却是深入我清涧苏区的一个钉子，尽管不及定仙塬据点之敌危害大，不过总是我清涧苏区腹地一患，拔除这个敌人据点，对苏区有很大好处。志丹同志胸有成竹，早已派人侦察过，掌握了张家圪台守敌情况。在我向群众讲话的次日

拂晓，他即命令各部队向张家圪台进攻。敌人驻守在张家圪台村子内，背后山上修了碉堡，村内修有交通沟，通到背后山上碉堡，村内之敌稍一闻风，即经交通沟爬入山上碉堡内，准备固守。我军根据敌人情况，从八十四师三团选拔射手占领敌对面山上，首先用火力封锁住，不许敌人从村内交通沟跑向背后山上；同时，一部分进攻村内敌人，另一部分插到敌背后山上攻击碉堡里的敌人。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将敌全歼，毙伤敌人二三十人，连长被打死，俘敌数十人，枪支弹药物资全部缴获。在打进敌连长驻地时，另一地方敌人曾打来电话询问这个连的情况，由于我军战士知识差，不懂得使用电话机，反而把机子砸了，结果失掉了消灭另一处敌人的机会。战斗结束后，绥、清一带群众皆异口同声地称赞刘志丹同志真英明，说话算数，说打胜仗就打了胜仗，真是老百姓的知心人。

七、打开延长城，解放延长、延川两县。

张家圪台战斗后，红军决计向南奔袭延长城。为了迷惑敌人，使其造成错觉，刘志丹同志一方面指示当地游击队、赤卫队围困定仙塬之敌，给以不断袭扰，使之不得外出清剿；另一方面指派马义同志带领绥清游击队、赤卫队，以红军主力旗号虚张声势，积极向绥德城附近活动，佯装攻打绥德，以便把敌人注意力引到绥德方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主力红军隐蔽而又顺利地向延长城方向前进。主力红军进至交口镇附近，部队休息了一天，又进一步调查了驻守延长城敌人的分布、城墙的高低、哪些地方容易进攻等情况，了解到延长城驻守着高桂滋部一个骑兵连，连长是高的外甥，全连共四个排，每排四个班，约一百八十余人，全是黑马，枪支弹药很充足。另有民团二三百人，协助守城。这个民团是地头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一听到红军游击队，就全部出动追打。刘志丹同志根据敌情，决定派红军八十四师一部和游击队，先出发到延长县南区一带大肆活动，把城内民团引诱出来牵制住，减少城内防守力量，便于主力奔袭，其他主力各部挑选精锐人员组成奋勇队，准备爬城。事先还决定我在攻城取胜后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刘光显同志（二团政委）为审讯反革命分子的

审判员，并买了很多红绿纸张，书写大量标语，准备打进城之后张贴。一切部署就绪后，各部都按照计划进行，敌民团果然全部被我军诱出到城南一带牵制住，城内只剩骑兵连防守。于是我军便星夜向延长城进发，拂晓前全部到达城下，迅速从西、南及东北角三处爬城，在敌人毫无知觉之际，被我生俘了城门楼内还在睡觉的全部守敌，随即一面向两翼扩张，一面将城门打开，我军全部打进了城。敌不支，退缩于城内中心点连部院内固守。我军组织力量激烈战斗，将守敌一个连全部歼灭。此时，被我诱到城南之敌民团，闻我军已攻破城池，慌忙撤退，企图增援城内守敌。我军一部尾追于烟务沟一带将其包围，攻占县城之我军又从城内出动，到烟务沟协同将敌民团一举歼灭，团总李明武被击毙，延长重镇甘谷驿之敌民团数十人亦向我缴械投诚。从此延长全县得以解放。延川之敌闻我军攻占了延长县城，恐慌万状，守敌随即撤出，狼狈奔逃于清涧境内，延川全县也随之解放。这是我军在陕北打开的第一个城市。两县全境完全解放，不仅缴获敌人大量枪支弹药，而且还没收了敌政府以及豪绅地主的大量物资。为了严明纪律，在没收工作前，我军作了很多具体规定，如没收的东西不经允许，任何人都不准拿走一点；没收人员都要佩戴红袖章，防止有人浑水摸鱼；没收的东西要清册上帐，工作人员要互相检查，一丝不苟。记得当时没收到很多白糖，有的同志建议分吃一点，志丹同志不同意，指示我们全部送往后方医院分给伤病员吃。

为了维持县城秩序，正确执行工商业政策，我军出了安民告示，并决定由贺晋年同志负责城市治安工作，随后于五月三十日在延长期城内开了祝捷军民联欢大会，刘志丹同志讲了攻占延长期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军民为尽早把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连成一片而继续战斗。大会进行中，镇压了敌县长及几个罪恶很大的豪绅地主。对于缴获的军用物资和枪械弹药，分给各部队；将没收的大量物资钱财送回后方交政府处理；马匹除为步兵留几匹老马给通讯员使用之外，全部补充了骑兵团；俘虏不愿留者发给路费回家，愿留者补充给骑兵部队。这次战斗之后，总指挥部特意商定，凡这次参战的指战员，都发给四块白洋作为个人零花费用。这是当红军以来第一次发的薪金。这次战斗胜

利的意义很大，为今后把陕北、陕甘两苏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证明我军不仅能消灭苏区内孤立之敌，也能消灭进攻苏区运动中之敌，还能攻占和消灭苏区外围防守薄弱的城市之敌。

八、安塞县的几次战斗。

部队打罢延长城后，经过两天穿越森林的行军，决定奔袭甘泉城，途中在离城二十余里的地方休息下来。由于部队行军过于疲劳，同时又喝了梢林生水，大都在泻肚子，走不动路，掉队的也不少。志丹同志召集各部队领导人商谈攻打甘泉城部署时，大家一致提议不要打了，顾虑攻不下城时，恐战士情绪和士气受影响。志丹同志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甘泉城。（事后看来，如果当时决心大一点，甘泉城也可能攻克下来）第二天，部队向陕甘苏区下寺湾村一带转移，同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苏区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会合。到达了下寺湾，刘志丹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一面布置工作，一面让部队稍加休整，并号召部队募捐一点钱，慰劳陕甘苏区在下寺湾休养之伤员。正在这时，接到安塞县地方同志和游击队报告，说安塞县高桥寨子敌民团数十人提出想和红军谈判，准备缴械投诚，但因考虑游击队力量小，正在犹豫不决之中。志丹同志当即命令我和贺晋年带红一团去高桥寨。我们将部队带到了高桥寨子，顺利地接受了敌民团投诚，寨子附近各村也就从此宣告解放了。第二天，志丹同志带领其余主力红军来到这里，连口气都顾不上喘息，便决定向敌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进击，决计攻占兴隆寨子，消灭固守之敌。由于守敌都是当地民团，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这里地势险要，除了一条小路经过吊桥可以通入，四周很难攀登上去，守敌构筑的工事也十分坚固，因而尽管我军从四面包围，几经攻击，仍然未下。最后，大家献计献策，利用火牛阵、埋炸药，诱敌打枪，消耗他们弹药，同时加速构筑工事，以便发挥手榴弹的威力。经过激烈交火之后，敌人觉得难以再守下去，于傍晚时分悄悄溜出包围圈，大部分从山地小路突围出去逃奔延安，少部分被我歼灭，随之县政被我摧毁，由当地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同志组成了苏维埃政府。

兴隆寨子解放后，志丹同志率全军进到李家塌寨子。这个寨子仍由本地民团、地主豪绅固守，反动透顶，构筑的工事更为坚固，只有后面连着个小山，但却挖成深沟，通过吊桥才能上去。我军包围几天强攻数次，均未成功。一个下午，志丹同志和我爬到寨子对面山上进行观察，发现只要火力从南面把敌人封锁住，是完全可以强攻上去的。当时派通讯员请来贺晋年同志，又详细地观察了一下地形，最后决定要贺晋年同志在部队中选拔勇敢善战的指战员数十名，由他率领从南面往寨子上强攻。由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团挑选好射手，在寨子对面山上以火力掩护；另外派一部分红军在敌后山上佯攻，以便分散敌之注意力。贺晋年同志率领奋勇队随即从南面强攻。攻势开始后，敌人用手榴弹、石块、脸盆、坛罐等物向我军猛打，贺晋年头部负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继续率领部队向寨子上攻击，最后在我军勇猛打击和各部队密切配合下，终于爬上了寨子。寨门打开了，主力部队一齐涌进寨门，经一小时激战，将其死守之敌全部歼灭。安塞全县解放了，消灭了这些地主反动武装，铲除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真是大快人心。

九、攻占靖边县城，吓跑保安敌人。

安边堡是陕西比较富庶之地，为了解决红军冬衣和后方党政军民机关的物资问题，我们决定攻占安边堡。正当部队向安边堡进军途中，突然接到西北工委来信，说敌人要进攻驻在安定苏区我党政军机关，要红军撤回到后方，保卫苏区和保护党政军机关。刘志丹同志立即同各级领导同志商谈，判断敌人向我安定苏区大举进攻可能会有，决定派八十四师红二团回后方向石湾一带活动，其余主力也改变原来计划，可以随时返回安定苏区配合红二团打击来犯之敌，保卫后方安全。经两三天之急行军，六月中旬进抵靖边县。志丹同志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登城攻敌，于拂晓前在东门登城成功，部队随即从东门而入，但只攻占了东门局部地区，南门、西门、城中心之钟鼓楼以及北门高地等制高点，均被敌人控制，致使我军处于十分不利的环境之下，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稍有一举一动，就会立刻受到敌火力杀伤，无法攻击前

进。这时，老三团派通讯员向志丹报告部队处境十分困难。刘志丹听后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让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从东门一带进攻，增援老三团，协同打击城中之敌；八十四师红三团从南门攻击，强占街道中心之鼓楼；义勇军攻击北门，强夺城北高地；红二十六军二团为预备队。战斗全面打响之后，各制高点争夺战打得极为激烈。经过数小时反复残酷的搏斗，终于将守敌井岳秀部能打的一个营消灭掉，惟独营长屈子鹏带十余人漏网逃脱。但我决不放过一个，随即乘马追击，终将敌营长击毙，其余人员全部生俘。这次战斗俘虏很少，大都被我击毙。而我军也伤亡很大，特别是勇敢善战的连排班基层干部。

靖边城战斗的胜利，打出了我军的威风，震动了三边一带，使保安之敌不打自逃，靖边、保安两县获得全境解放，从而使得陕北苏区与陕甘苏区的广大地域真正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为我军的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十、老君店战斗。

部队在靖边战斗后，稍事休整，即转回安定苏区南沟岔薛家渠隐蔽集结。这时，地方工作的同志报告，敌高桂滋部艾捷三四个营，正在三皇峁一带骚扰，抢劫群众粮食物资。刘志丹同志当即决定打击这些害民之敌。当部队早饭后正在沟内集合听动员之际，敌人忽然从南沟岔大川上来，沿途逐村抢劫。我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遂隐蔽迁回到敌后，断其退路，把敌先头部队全部歼灭，其余红军主力随向南沟岔正面之敌攻击。我红一团插入敌后猛冲猛打，很快将敌先头部队一个营冲垮，并全部歼灭。敌团长弃马逃跑，敌后续部队在我主力突袭下不支溃退，慌忙逃进民团驻守之老君店山寨子固守。我军尾追至此，攻击多次不克，黄昏时退出战斗。这次虽只消灭敌人一部，但对其打击很大，艾捷三逃回绥德。从此，高桂滋部无力主动出击苏区，只能龟缩在各个城市防守。

十一、吴堡县慕家园子战斗。

我军在南沟岔战斗之后，闻听阎锡山的晋军李生达师马旅过河西进至吴堡、绥德交界定仙塬一带，配合陕北敌人围剿我吴堡、绥德苏区红军。志丹同志召集各部领导人议定，准备乘敌初过黄河立足未稳之际，先给以迎头痛击，以便达到其余敌人不敢再过河围剿我苏区之目的。所以，决定部队先进至清涧袁家沟花岩寺一带，具体了解情况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当部队刚刚到达袁家沟一带时，他又召集各部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决定抽调精干指战员组成一支进击部队轻装前进，其余人员留守清涧，由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同志负责指挥。部队编组后，即由清涧花岩寺出发，经两夜急行军，很快到了吴堡县的宋家坡村一带。这个村子是吴堡县境内的一个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易于保密。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以后，于当晚出发攻打慕家园子之敌。慕家园子是个大村子，也是吴堡县的中心点。驻守这个村子的敌人，四面修了土围子，严密地控制着周围各村，对我开展革命活动危害很大。首先拔除这里的守敌，对于打击过河西来犯之晋军具有重大意义。

拔除慕家园子据点，必须打击各地增援之敌。志丹同志命令除少数兵力围攻守敌外，决定由红二十七军一团打由宋家川增援之敌，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三团打幸家沟和岔上两地增援之敌。不出所料，敌人果然前来增援。由于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因此增援之敌很快被我一一歼灭，缴获武器甚多，内有重机枪一挺。当天下午，志丹同志动员大家再接再厉，下决心攻克慕家园子。随即由红二十六军老三团、义勇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二团、三团组成奋勇队，从四面发起猛攻，一番激烈战斗，虽然我老三团团团长王世泰同志负伤，但终于将敌全歼，拔除了吴堡苏区中心这一坚固据点，从而巩固了苏区，扩大了游击队，装备了赤卫队，使吴堡的革命活动重新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慕家园子战斗结束后，我军转移至宋家坡一带休整。群众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纷纷前来送猪、送羊、送面、送鞋，以表对红军的拥戴和慰问之情。其中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气跑了几十里路

专程来总指挥部要看望刘志丹同志。他们问我，能不能看望？我说能哩，老汉们高兴极了。我引他们见到志丹同志时，他们握住刘志丹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都重复着一句话：“啊，你就是老刘，你就是老刘啊！”由此可见，群众对刘志丹同志是多么热爱，多么敬仰，打心眼里认为老刘是他们的贴心人，是他们的领袖。

十二、定仙塬战斗。

慕家园子战斗后，我军转移至绥德东区梁家甲、义尚坪、申沟一带。这时，适逢佳县螳螂峪、王家坪井岳秀部一个营长带兵正向我苏区进犯。我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随之发起反击，一举打垮了来犯之敌，敌营长弃马逃去，马匹被我缴获。

此后，部队正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西北工作委员会派张秀山、霍维德两同志持工委文件来到部队，要我主力红军北上，打到神府苏区去，并护送他们两人到神府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志丹同志召集各部领导同志一连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如何执行西北工委指示信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红军主力北上神府是不适当的。一是我对过河晋军虽然打了一仗，取得了胜利，但并未打痛他们，敌人还有力量向我苏区围剿。如果红军分一部分兵力北上神府，不易打到神府；但如红军主力远离内地中心苏区，一旦敌人向我进攻，我军则来不及折返内地给予回击，恐中心苏区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二是由吴堡苏区到神府苏区，中间有两天多的路程是白区，并且人民群众多被敌人强迫集中在寨子上，一切行动由敌派兵监视，我军将得不到沿途群众的支援，不仅吃粮没有保障，伤员也无法安置。最后决定，部队仍然撤回绥德苏区，围困定仙塬，以便打击增援之敌；待我军进到定仙塬之后，首先令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一部包围定仙塬，其余部队分头驻在敌人可能增援的必经之路一带，待机消灭增援之敌。这时，定仙塬已换成晋军马旅一个营固守，敌旅长亲自带一个团前来增援。当敌人进到我军驻地井不烂沟附近时，刘志丹同志立即命令各部队紧急集合，跑步占领制高点。然后，命我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正面攻击，红二团从南侧攻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老三团、义勇军

从北侧攻击，红三团、五支队从敌后路攻击。总攻信号发出后，我各路部队犹如猛虎扑食，猛打猛冲，虽然敌人在山地筑有临时工事据守，但在我军勇猛冲击下，只好溃退到一条沟里，结果被全部歼灭，敌旅长化装逃跑，敌团长被击毙，缴获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冲锋枪、步枪等千余支，还有大批整箱弹药。被俘官兵除自愿当红军的和有技术的留下之外，大都发足路费遣散回家。这次战斗的胜利，给过河围剿红军的晋军李生达部以迎头一棒。经过这一打击后，阎锡山惟恐晋军再遭不测，仓皇将其部队撤回山西境内。从此晋军再不敢过河打红军了，我苏区更加巩固了，我军武器装备也有了更大的改善，枪支弹药更加充足。缴获敌人的八二迫击炮、重机枪组编成为一个机炮连，把俘虏中的迫击炮手、重机枪手补充进枪机炮连里，为训练我军掌握这些武器所用。

十三、横山城奔袭未果。

打完定仙塬，部队稍事休整，便转移至延川拐峁一带。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初，听说北方局已派朱理治同志来陕北主持工作。刘志丹同志亲自向我交待，要我去延川永坪镇西北工委请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来部队作报告，他自己带部队到文安驿一带休整，以便等待朱、郭前来传达中央和北方局精神。我乘马当日到了永坪镇，很快找到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第二天就和他们一起到了文安驿，休息了一晚，于次日由刘志丹同志主持在一个戏楼上召开了连队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理治同志作了政治报告，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西北形势和西北红军的任务。他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求陕北红军先在南面打下延安县城，北面打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县城；并且，批评陕北红军过去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比较系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报告。听后，大家都觉得不大对头，纷纷议论说，这样的报告既不切合实际，又不解决任何问题，夸夸其谈，倒象是王妈的裹脚布子，又臭又长。刘志丹同志把朱的报告称作是空想。大家一致认为，朱的批

评是强加于陕北红军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尽管当时未进行公开驳斥，但实际行动上却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听完报告后，得知东北军进到陕西省，参与围剿陕甘、陕北苏区和红军，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洛川、富县、甘泉、陇东一带，当时还不知红二十五军也到陕北境内，更不知中央红军北上到陕北，只以为东北军是专门围剿西北红军的。刘志丹同志召集各部领导人研究，认为东北军来势很凶，一定会大举进攻我西北红军和苏区，今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南面粉碎敌人的围剿。

过去，我们从未和东北军接触过，不知其战斗力强弱，武器装备如何。所以，决定先由黄罗斌同志带二十六军老三团到洛川、富县、甘泉一带活动，侦察敌情，伺机打击敌人，摸清敌人武器装备及战斗力等情况，以便根据敌人的弱点给以迎头痛击。

为了下一步南下粉碎敌人围剿，必须先将北面威胁我苏区横山之敌歼灭，消除背后之患，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南面之敌。因此，志丹同志亲自率领主力红军星夜兼程向横山县城进发，拂晓前到达横山城下，随即作了部署。由于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片面之词，对县城情况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致使我登城云梯尺寸不当，多次攀登不上，被敌人发现，故而奔袭未获成功。尽管如此，我军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战斗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众所公认的。

从我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一直到红二十六军老三团、义勇军北上会合，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的领导统帅下，经过九个多月的英勇奋战，连克五县城，解放六个县，把陕北苏区同陕甘苏区打成一片，整个苏区南面除延安、甘泉、富县、洛川，北面除瓦窑堡、清涧、绥德、吴堡宋家川、米脂、横山县十个孤城以外，完全联成了一片，成为巩固的红色区域。在苏区，土豪劣绅被铲除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了，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使这里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消灭了大量的敌军，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装备。我军装备改观了，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壮大。经过战争的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指挥能力、战术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培养锻

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使我军很快成为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打击敌人的一个连发展到打击一个整营、一个整团，证明新生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第三次反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首先是由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同志根据陕北当时当地客观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指挥了战争。无论是战略选择、战役制定或战术运用上，都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的。比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对深入苏区之敌，首先采取调虎离山、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之，然后再打苏区外围孤立无援、守备薄弱之敌；城镇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等。这对于取得陕北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从整个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斗争中看，人民群众无论从人力、物力上，都大量地积极地支援了战争，保证了红军作战的需要。如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证我军耳灵眼亮，使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战争中大批大批的赤卫队员积极配合参战，四面包围敌人，摇旗呐喊，助我军威。所以，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陷敌于挨打被动地位，保障我军迅速地消灭敌人。战争为了人民，人民才是胜利的源泉。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胜利，充分说明只有人民战争的威力才是无穷的。

第三、有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型的工农红军。这支军队是真正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由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广大贫苦农民组成的，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官兵团结。它也是在战斗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具有连续作战，斗志顽强，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斗争勇气。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保卫苏区，发展苏区，巩固苏区，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伟大胜利，正是凭借着党领导的这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人民武装力量。

第四、各级党组织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领导作用。无论是在红军内部，党员、团员始终把反围剿斗争当成一切工作的中心去完成，而且他们在战争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真正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崇高责任感。

（二）

横山县战斗后，部队转移至安定县玉家湾、魏家岔一带。工委来信说，红二十五军北上已经到达永坪镇，要我们部队迅速开到永坪镇附近，同二十五军会师。这一情况向部队传达后，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志丹同志专门召集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一是由志丹同志起草一份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宣言，二是号召部队一定要虚心向红二十五军学习，三是要求部队严于律己，主动团结红二十五军同志。第二天，部队开进永坪镇南一带休整。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九月初的一个晚上，在永坪镇一个学校教室内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宣布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同志组成中央代表团（是否有郭洪涛同志记不清了），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同志任书记，郭洪涛同志任副书记。在军事上，撤销了刘志丹同志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由聂洪钧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统一整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由徐海东同志担任，政委由程子华同志担任，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将原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为杨森同志；原二十七军的八十四师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为贺晋年同志（原师长杨琪同志调往后方），政委仍为张达志。每师下辖两个大团。部队整编结束后，于一九三五年的“九一八”那天，召开了成立红十五军团军民联欢大会。会上，徐海东同志、刘志丹同志发表了讲话。志丹同志讲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的重要意义。他热情地指出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大大地加强了红军的力量，号召大

家英勇作战多打大胜仗，以实际行动欢迎红二十五军；同时，希望大家向红二十五军老大哥学习，学习他们作战经验，学习他们建军经验，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严守纪律，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而奋斗。会后稍事休息，即决定在甘泉县的劳山地区伏击敌东北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山战役。

部队隐蔽地经过延安东南地区，直插洛河川一带，到达目的地后，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和游击队包围甘泉城：二四一团隐蔽集结甘泉县西区吴家沟待命，堵击由延安向甘泉增援的正面之敌，务必不使敌人进到甘泉城；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从左翼侧击敌人；红二十五军迂回敌后包剿；待敌进至我伏击圈内，即由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从正面发起主攻，堵击敌人；我军主力则从侧面向敌背后夹击合围，以便压敌于劳山沟内，聚而歼之。正如所料，敌师长何立中带领两个团的兵力，于十月一日由延安出发增援甘泉守敌，途经劳山，正陷入我军埋伏圈内。我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当即发出总攻击号令，遂将增援之敌堵击在劳山沟内。敌人见势不妙，强行占领劳山东西两侧高山，以三面火力压制我正面堵击的二四一团，企图攻击前进到甘泉县城。这时，我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的贺吉祥、贺大增两同志身先士卒，带二营奋勇攻占东山制高点。为了减轻敌人对我二四一团的压力，并使之继续从正面向敌攻击，贺晋年同志和我带领师部警通连、侦察连奋勇冲锋，攻占了西山一个山岭，经过将近三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堵住了敌人通道，保证了我军主力顺利合围，黄昏前援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全部被我压于劳山沟内歼灭。在这次战斗中，我二四一团打得非常英勇，伤亡也很大。共计牺牲营政委两名，连排长多名，战士一百余人，负伤营政委二名，营长二名，战士二百余人。

劳山战役，我八十一师指战员虽付出了很大牺牲，但给第三次围剿红军之敌以迎头痛击，完成了正面堵击敌人的任务，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

劳山战役刚刚结束，军团命令我八十一师由新任命的军团政治部主任率领，向富县杨圈园子一带活动。当我军进到该地时，发现一个

很大的土围子，驻扎着敌军。按理说，应该立即侦察敌人兵力部署情况，观察好地形，然后确定如何打击敌人。但是，这位军团政治部主任既不让侦察敌情，又不让观察地形，在情况极不明了的条件下，竟下进攻土围子的命令。我军无奈，只好让二四三团首先进攻。由于敌人固守在四面都有防御工事和火力点的土围子内，而我军又处于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只有一条险要小路可以通过，所以我攻击多次无效，而且伤亡不小，团长也负了伤。最后又调二四一团，由团政委李赤然、参谋长路文昌带领攻击。李、路两同志率众猛攻，仍未攻克，他二人也先后负伤，部队又有伤亡。这样的消耗仗实在不能继续打下去了，最后报告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才允许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是在情况不明、地形不清之下，逼迫下令打的一次糊涂仗，我军伤亡很大，士气受到影响。

为什么劳山战役刚完，就命令我八十一师到杨圈园子一带去打硬仗、打糊涂仗呢？事后才知道，他们完全是为了把八十一师和七十八师分割开，以便于在七十八师内进行肃反，逮捕营以上干部。当我们撤回甘泉王家坪途中宿营时，无故将我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同志逮捕。在路过下寺湾顺便看望鲁学增同志时，我发现大院内关押了几窑人，才知道是在大搞肃反运动，而且搞得如此之凶。我和贺晋年同志回到宿营地彻夜未眠，深为此事忧虑，预感到不幸的遭遇即将来临。

事实上，从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即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在劳山战役后，陕甘、陕北党政军、前后方，已经开始了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大规模肃反运动。直至榆林桥战斗后，党中央、毛主席到达了陕北，才刹住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

我西北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和统帅下，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战役的初捷情况下，革命形势对我军是非常有利的，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的胜利。可是在大好形势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在西北党内军内进行规模的肃反运动，将我

西北人民敬重的革命领导人刘志丹同志和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同志，如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杨琪、杨森、郭宝珊、黄罗斌、高朗亭、任浪华等等，以及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营以上干部，统统扣以“右派反革命”、“富农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下狱，使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有的同志被活埋，有的同志被打死，即使幸存者，也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同贺晋年同志当时虽然没有被捕起来，但已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中，并且在工作上已是不可信任的了。以后将我由八十一师调换到七十八师任政委，榆林桥战斗后，又把我调离七十八师到十五军团任民运部长。

错误的肃反运动，一时弄得乌烟瘴气，使西北红军指战员惊恐不安，群众慌乱不定，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革命根据地在内忧外患之下，也将有断送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的危险。

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为什么敢于肆无忌惮地大搞肃反运动，大肆逮捕刘志丹及一大批优秀革命干部，惨无人道地杀害我党员和干部呢？一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在永坪镇会议后占据了西北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他们上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的支持，下有那么一些有力的拥护者。他们所以这样不受任何约束地大搞肃反，大肆逮捕迫害，目的就是为了解扫清障碍，以实现其顺利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目的。

打完杨圈园，部队到达毛家坪休息两天之后，接到军团部命令，调我到七十八师任政委，八十一师政委由张明先接任（张在抗日战争时逃跑）。在我调往七十八师之前，为了安定军心，不使部队发生恐慌，我和贺晋年同志商量调二四一团政委李赤然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虽然他在杨圈园子负伤未愈，但为了安定部队情绪，只好这样决定，因为李赤然同志从红一团成立时就在这个部队，同广大指战员关系好，便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我调离八十一师时，确实有些依依不舍，特别是在那样不寻常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更是难舍难分。

我调到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同志）后，到任两天即决定打榆林

桥之敌。榆林桥位于甘泉县南，富县以北，洛河之东。该镇东西两面是山，中间是洛河，河川宽百米左右，敌人构筑工事坚固。战斗打响以后，我七十八师占领东山，以火力封锁榆林桥，向榆林桥镇街正面进攻。红七十五师从榆林桥背后山上往下攻击。红八十一师虽未给以明确具体的战斗任务，只是相机攻击，但他们看到东山七十八师处于开阔地，敌人火力又强，不易下山接近攻敌，于是贺晋年、李赤然二同志主动带部队从榆林桥北门城楼攻击，一举突破敌阵地，占领了北门，歼灭敌人一个整连，打开了突破口。贺吉祥、贺大增两同志带一个营随后紧跟，向敌攻击。这时东山、西山我军一齐攻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敌团长高元峰被俘，顺利结束了战斗。

这次战斗是在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中打的。我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体指战员都有一股子气，与其被内部肃反逮捕、处死，还不如在战场上同敌人拚死好，所以仗打得格外勇敢，真不愧为党领导的红军。

榆林桥战斗结束后，郭洪涛和崔田民同志来到军团部。我是在行军路过军团部时见到他俩的，只打了个招呼，并不知他们的来意。我们部队到达道草铺休整时，仅隔两天，军团部又调我到十五军团政治部任民运部长。崔田民同志接替了我七十八师政委职务。我来到了军团政治部，遇到了张毅忱、高农夫、阎志清、惠志高、李树荣同志，他们都是陕北人，是我的干事。就在这个时候，听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家都很高兴。不过，由于错误的肃反运动，人们仍是心有余悸，心神不安，情绪不高，尽管这时部队中已经停止了捕人。

（三）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的肃反运动，挽救了西北党、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人民群众。

为彻底粉碎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决计打击敌牛元峰师于直罗镇。十五军团打开张村驿镇

后，即驻扎在该镇。我当时对王明路线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错误的肃反运动和一些恶劣的军阀习气极端不满，有一肚子怨气，很不安心在十五军团工作，曾向党组织写信要求调动。就在此时，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十五军团。他知道我有意见，亲自找我谈话。我虽然知道周恩来同志，但并未见过他，而在谈话时又没有向我介绍他的姓名，我只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热情亲切，但仍不敢向他说出心里话，只说我不愿意在十五军团工作，干革命哪里都可以，要求调动。他看到我心有顾虑，便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尽管给我讲。我听后顿时心情开朗，解除了顾虑，感到有希望了，敢于向他说心里话了，遂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错误的肃反运动杀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干部等等向他作了汇报。周副主席耐心地向我作了解释，说明肃反已经停止了，已派人到瓦窑堡把刘志丹等优秀的老同志全部从狱中放了出来，再不会错误地捕人了，并说以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经过这次谈话，使我直接受到了周副主席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这是我终生难忘和这样，我安心了，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十五军团工作。周副主席听了也很高兴。第二天，他又召集我们民运部的全体同志开了会，亲自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为了打直罗镇，消灭敌人，他要求我们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积极做好支援战争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我们在张村驿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把老财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组织贫农会，儿童团等等；同时，还要我们在战斗打响后，组织好担架队赴前线抬伤员，在张村驿组成伤员转运站、俘虏转运站，烧好开水，煮好米汤，以便给伤员们吃喝。我们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每天分组四出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使他们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经过十余天的努力，张村驿周围的土地全部分配给了贫困农民，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起来，各个群众组织也都相继成立，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了主，形成一片喜气洋洋的革命景象。十二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直罗镇敌一〇九师牛元峰一个师，又追

至黑水寺附近歼灭了敌一〇六师一个团。我们民运部全体同志依靠群众，在张村驿转运了伤员及俘虏兵，顺利地完成了周副主席交给的支援战争的任务。

直罗镇战役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彻底粉碎了敌人对我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扩大了陕甘苏区，又新组建了一支红二十九军，为尔后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开拓了门路。党中央正确的统战政策，深入到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从此他们再不向我苏区发动大的进攻了。战役结束后几天内，毛主席在道洞源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团以上干部大会，报告了形势，提出了发展陕、甘、宁、晋等省苏区的任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口号，提出了如何做好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

这次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所以陕甘人民同声称赞党中央、毛主席英明伟大，称赞中央红军不愧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领导的一支热爱人民的工农子弟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民群众从心眼里拥护这支工农红军，踊跃报名参加中央红军，纷纷送慰劳品给中央红军，表现出一派团结胜利的景象。

正当王明路线推行者使西北革命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毛主席、周副主席得知刘志丹同志及一大批优秀领导人仍然在狱中受着严刑拷打，一方面下达命令不准捕人，不准杀人，另一方面委派王首道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妥善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王首道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释放了全部被捕下狱的同志，并当场宣布给予平反，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运动。不久，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到瓦窑堡，严肃地批评了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所犯的严重错误，亲自找刘志丹同志谈话，并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司令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其他同志也都一一安排了工作。当刘志丹同志为首的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被释放的消息传出后，西北红军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齐声高呼毛主席、周副主席是我们西北人民的大救星。

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我们这些共同艰苦奋斗过的同志们，听到这一喜讯后，顿觉前途光明，信心倍增，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而且也挽救了西北党和红军，使西北革命有了新的发展，红军更加发展壮大，陕甘宁苏区更加巩固，为以后建设成为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指挥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

驰骋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骑兵团

高 锦 纯

一、陕甘红军最早的骑兵部队

党在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武装的斗争，早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了。其后，曾举行过清涧、渭华和旬邑三次暴动，但都遭到了失败。一九三〇年，刘志丹在保安县永宁山建立了一支几十个人的游击队。从此，陕甘地区有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一九三一年九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师储杰、杨仲远等领导的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在南梁地区的林锦庙胜利会师。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省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将这两支革命武装合编，并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将合编以后的队伍正式命名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

但是，我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骑兵部队，是在一九三二年才有的。

一九三二年初，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原，并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进行整顿。同年二月，在整顿的基础上，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下辖两个步兵大队，一个警卫大队，一个骑兵大队。这个骑兵大队，就是我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革命武装中最早的骑兵部队。当时的骑兵大队大队长叫强龙光。保安瓦子川整军时，强龙光因外出医伤，阎红彦任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我当时由政治处下到骑兵大队当战士，班长叫强世清，排长叫贺耀华，同班战士有芮四等同志。骑兵大队成立后，曾先后在保安之墩儿梁、合水之平正川、富县之套筒原、赵八寺以及子午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杜衡自任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二团团长，刘志丹因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任团政治处主任。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随营学校、政治保卫队等，共二百余人。

红二团骑兵连，是红二十六军最早的骑兵部队。当时的骑兵连共有人马各八十余人，连长是曹胜荣，指导员是张秀山，我是支部书记。

骑兵连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陕西耀县和子午岭南端的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新苏区。

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骑兵连参加了红二团发起的焦家坪战斗，歼敌四十余人，并击溃井岳秀的援兵两个连，缴枪数十支。之后，又随红二团开辟了香山和九堡两块游击区，消灭照金、旬邑民团一部。此时，红二团发展到三百余人，又增加了一个步兵第二连，骑兵连发展到人马各百余。

一九三三年一月，骑兵连随红二团南下，帮助地方建立了旬邑、照金、芋园、香山、宜君五个游击队。三月，骑兵连随红二团回照金根据地，然后在淳化、耀县、正宁一带活动，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

五月，敌人调三个团及六个县的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革命根据地。杜衡未经陕西省委同意，于五月下旬擅自率红二团南下，骑兵连随行。当队伍行至三原北寇家庄一带时，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离部队去西安，部队政委由汪锋代理，刘志丹任参谋长。六月，部队在兰田张家坪被五千多敌人包围，被迫丢掉辎重，分三路突围。骑兵连的战马在战斗中有所损失，加之长期行军打仗，马掌损坏，无法行走，丢掉了不少。突围后，骑兵连及红二团剩余人员在终南山中辗转苦战两个月，终因人地两生，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最后只剩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曹士荣、杨祺、黄罗斌、刘约三、王有福、魏武、马宜超、高照、惠泽仁、康健民、杨文谟、王

兆祥等百余人，于八、九月间分散化装返回照金革命根据地，这其中有不少是骑兵连的战士。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骑兵连这支陕甘红军最早的骑兵队伍，虽然由于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遭到了失败，但是，它为后来骑兵团的组建锻炼培养了干部，积累了战斗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算作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的前身。

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的成立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中共党员）率国民党杨虎城部之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失败后，剩余九十余人退到照金，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当时根据地领导认为，应该有一支红军主力部队来领导这支起义过来的队伍。于是在渭北游击队武字区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四团。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红四团胜利地袭击了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缴获了一部分马匹，为后来骑兵团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之后，在耀县薛家寨宣布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红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合水县莲花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下属一个师——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委员高岗。四十二师下设两个团，骑兵团和第三团。骑兵团团长是黄子祥，政委是杨森（后来是张秀山）。骑兵团下属两个连，第一连是骑兵，有几十匹马，李子伯任连长，开始没有指导员，十里塬战斗后把我调任指导员；第二连是步兵，高占胜任连长。

为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兵分两路，积极向反动民团出击。师部率三团向东北方向出击，在洛河川、葡萄沟门击退敌八十六师一个营。骑兵团向西北方向出击，全歼新堡民团，并在荔园堡、阎家洼子歼敌陕西警备旅两个连，接着又消灭了

赵沟门民团，然后回师二将川。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三、杨家店子遭袭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我骑兵团驻在杨家店子。一天，李有福带两名战士出外侦察，不慎被山后一连敌人俘虏。敌人知道我骑兵团情况后，立刻前来袭击。

杨家店子是一个小镇，由南向北的街上，有一家骆驼店。我骑兵团战士就住在骆驼店里。骆驼店是大院子大门，房子后墙上开着很大的窗子。这天，下着小雨，战士们都躲在房子里，坐在炕上休息。忽然村头传来了枪声，待战士们从窗口往外看时，敌人已冲进了镇子。战士们立刻奔出房子，仓促上马迎敌。敌人虽然只有一个连，但因为精神准备，打得凶猛顽强。骑兵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军冲过去，稍一停顿，敌人又反扑过来。我一连一班长宋飞的战马负伤了，他仍然策马向敌人冲了过去。这样反复拼杀了四次，才终于把敌人消灭。战斗中我骑兵团几名战士负伤，战马也被打伤了几匹。战斗结束后，宋飞去看他的战马。那马躺在地上，肠子流了出来，听见主人的声音，它流着泪，哼哼着想爬起来，但是这匹负伤后仍然顽强冲锋过的战马却再也爬不起来了。宋飞非常痛惜，他怀着无限深情，和这个不会说话的战友依依告别。

战斗中俘虏了敌人的连长。这个连长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和刘志丹同过学，他主动讲明了这层关系，希望红军看刘志丹的面手下留情。同志们请示刘志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拉出去砍了！”

四、城壕川遇敌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我骑兵团在华池县城壕川一带活动。一天上午，部队在川道里行军，杨森带着一连一班，作为尖兵遥遥走在部

队的前面。转过一道山口，忽然发现四五百敌人，这里一群，那里一堆，围坐一起正在吃饭。“怎么办？”一班班长宋飞一边观察敌情，一边请示杨森。我尖兵班只有十二个人，和几百敌人相比是绝对劣势；但我们是骑兵，敌人是步兵，我们有准备，敌人则毫无防备，从这一点上讲，又占有一定的优势。杨森在马上稍加思索后，果断下了命令：“冲！”

十二匹战马，象十二支离弦的箭，向敌群冲去，战士们开枪射击着。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吓昏了，立即四散着向原上逃去，后来发现追兵极少，这才停止脚步，组织反攻。我十二名战士退到沟边上，敌人仍然紧追不舍，于是战士们只得连人带马跳下沟去。在这紧急的时刻，我骑兵团后续部队从川道里赶来了。十二名骑兵战士又和大部队一起，反冲过去。敌人见势不好，望风而逃。骑兵团在追击过程中，俘敌十余名，还俘虏了一匹栗色高头大马。

据俘虏供称，他们是国民党庆阳民团谭世林部，带队的就是谭世林本人。敌人这次出动是为了配合他们正规部队，“进剿”红军，没料到，刚到城壕川，就损兵折将，被我骑兵团打散了，并且连谭世林的坐骑也被我们俘虏了，就是那匹栗色高头大马。那是多么好的一匹马呀！它膘肥体壮，栗色的鬃毛在太阳下发着油亮的光，连蹄子也比别的马高大，俘虏它的骑兵班长宋飞很想换为自己的坐骑，可是“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红军铁的纪律，宋飞尽管恋恋不舍，还是把它交给了上级。

五、夜袭合水城

一九三三年十月，骑兵团奉命出发打合水，一起前往的还有红三团和地方游击队共二百余人，指挥者是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等。

合水县城驻有敌人一个连，还有县民团和县警察局的武装若干，城墙坚固，宜智取不宜强攻。这天夜里，骑兵团和步兵一起出发，到合水县城的西门，已经是下半夜了。大部队在城外埋伏起来，王世泰和强世清带领先头部队——手枪队和一支八十余人的步兵，偷偷爬上了城墙，待敌人发现抵抗时，城门已被打开。听到枪声，埋伏在城外的部队一齐冲进城去，城内敌人仓促应战，一半作了红军的俘虏，另一半随国民党县长逃出城去。红军进城后，烧了警察局，砸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我游击队干部杨培胜，释放了其他“犯人”。天明以后，红军召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给群众分粮分物。由于敌人长期的反革命宣传，群众害怕敌人回来报复，有些人不敢接受红军分给他们的东西。领导决定，部队分头深入群众，开展工作。骑兵团一连一班来到一位老太太家，讲明红军的政策，把衣服等东西分给她。她高兴地接受后，热情地给战士们做饭，并悄悄检举了潜藏在老百姓家里的伪县长老婆。这使红军战士们体会到，党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地群众的觉悟水平，一定要具体灵活地执行。

傍晚，传来了一个令人紧张的消息：耀县薛家寨被杨虎城部孙友仁团围攻了。薛家寨是红军的后方根据地，部队决定立刻回去解围。当天夜里，我进占合水县城的全体红军出城向薛家寨方向疾进。天亮后，下起了小雨。群众冒雨送来消息说，薛家寨已经失守了。部队又即折回，转向北原。此后，骑兵团单独在华池、庆阳一带活动，曾袭击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林的民团四十余人。

六、奔袭荔园堡和毛沟门击敌

转眼到了十一月上旬，天气越来越冷了。骑兵团得到消息：华池县茶园堡东面山上的土寨子里，驻进了国民党张廷芝部的招兵营，带队的是一个营副，叫梁邦栋，陕西旬邑人，手下只有二十几个兵，警备懈怠，且寨子破烂，易于攻取。这又是一次奔袭的机会。

拂晓，我骑兵团和义勇军悄悄地摸到了山寨跟前。敌人因为住的

时间长了，居然没有布置一个哨兵，当我军冲进寨子时，敌人还没有起床。战士们首先抓住了敌营副梁邦栋，其他人也都乖乖地作了俘虏。当天，骑兵团捣毁了寨子，处决了梁邦栋，对其他俘虏讲明党的政策后，全部释放了。

奔袭荔园堡之后，天气更冷了，虽然地里还堆着没有打场的包谷，河里却已结了冰。我骑兵团和义勇军住在离城壕川不远的毛沟门一带。

一天，战士们还没有起床，村头便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村子里紧急集合的哨子声，慌乱的脚步声，连成一片。人们本能地意识到：敌人袭击我们来了！当时战士们睡觉都不脱衣服，并且把枪抱在怀里，所以能够迅速起来，跨马应战。当战士们一边集合一边往外冲时，敌人先头部队几十人已经冲进了村子，红军战士把他们堵了回去。但是不久，村外河滩上有六七百敌人围了上来。怎么办？冲！只有冲出去才能摆脱危险。于是，红军骑兵团在前，义勇军在后，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大批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骑兵团战士这时全都下马步行，边打边撤。跑出五六里路，战士们都跑乱了，四散着还在往山上跑，跑到半山腰，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个领导人决定组织力量抗击。可是，山上没有工事，又缺少子弹，怎么抗击呢？后见山坡上长着半人多高的白草，便隐蔽进草丛，同时把手榴弹盖子揭开，等待敌人走近。

追击的敌人见红军停了下来，又不开枪还击，便高喊着“抓活的”“抓活的”，向山坡上蜂拥跑来。

草丛里，宋飞、边德云、戚石子、芮四、齐庭珍、蔡正祥等骑兵团七八个能打仗的战士，手握手榴弹，沉着地观察着。几位领导就卧在他们身后。待敌人冲到草丛跟前，边德云喊了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把手榴弹扔进敌群。前面的敌人扔下几具尸体，退了下去。此时，红军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向敌人压了过去。敌人有的把子弹袋丢掉，有的把枪扔下，相互践踏，狼狈溃逃。反冲过去的红军战士，一气追出二里多路，敌人全部被冲垮了。等到打扫战场时才知道，这次

被打垮的敌人是国民党杨子恒部赵文智团，共七百余人，他们本想袭击我骑兵团和义勇军，万万没有料到红军半路上掉回头来咬了他们一口。

七、十里塬打民团

陕甘边区淳化县有一块不大的高原，叫十里塬。塬上有个小镇，叫通润镇，这里驻扎着敌人的民团二十余人。我骑兵团侦察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袭击十里塬。

一九三四年一月间，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骑兵团冒着刺骨的寒风出发了。空旷的原野上，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马踏着积雪，鼻孔里不住地喷着一股股热气。

骑兵团到了镇子跟前，敌人才发现并开始抵抗。骑兵团战士们象旋风一样卷了过去。敌人望风披靡，一触即溃，迅即逃出了镇子。几名战士策马追出镇外，在积雪复盖的旷野里，突然跌进被大雪埋平的沟坎，战士从马上闪落下来，战马又倒压在他们的身上，压伤了肚子，就再未追击敌人。当晚，骑兵团就宿营在十里塬小镇上。几名压伤肚子的战士疼痛难忍，又无药医治。一班班长宋飞发现老乡家里有大烟土，便拿银元买了一点，借老乡的大烟枪，让几个负伤的战士抽用。他知道，大烟有剧烈的麻醉作用，抽大烟是可以止疼的。果然，只过了一会功夫，那几个战士的肚子就不疼了。过后，这事让指导员高锦纯知道了，对宋飞进行了批评，并让他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查，因为红军战士是不准抽大烟的。

这一年的腊月三十，刘志丹带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准备趁敌人过春节不防备时袭击耀县寺沟的土豪。寺沟也是一个小镇，镇外有一座土庙。除夕晚上，刘志丹派宋飞等六七个战士埋伏在镇外的土庙里，准备在土豪到镇外烧纸送鬼神时，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整整齐齐埋伏了一夜，土豪都没有出来，拂晓只好下令撤退。返回驻地的路上，正好和敌人二十几个民团团丁相遇。双方都无精神准备，开枪打了一阵，

敌人招架不住，便退到附近的一个土寨子里。在向寨子进攻中，宋飞等三名战士负了伤。因为敌人已首先抢占了有利地形，加上又是大年初一，刘志丹便下令撤退了。

这次战斗后，宋飞这位既勇敢善战、又会团结同志的年轻班长离开骑兵团，到红三团一连当班长去了。

八、元城子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回到合水蔺家硷。因王泰吉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任政委。

二月，蒋介石以国民党十七路军为主，纠集了八个团共一万余人的兵力，分八路向我南梁革命根据地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红军主力采取以外线歼敌为主的作战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红四十二师从耀县出发，打击歼灭北线之敌，接连打了九仗，骑兵团参加的元城子战斗就是其中的一仗。

元城子在华池县悦乐镇的东北方向。那里有一道南北方向的川，川中间的山包上修着一个不大的山寨，这山寨就叫元城子。山寨里驻守着国民党庆阳县民团谭世林部的一个连。

一九三四年三月，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指挥下去攻打这个山寨，口令是“肃反”，联络暗号是“活捉老谭”。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部队就出发了，骑兵团是部队的前卫。当时骑兵团只有两个连，在团长赵国卿和政委高锦纯的带领下，从华池县二将川出来，然后往北行进。到了元城子，骑兵团从川里发起冲锋。谭世林的民团稍加抵抗，就弃寨逃跑。骑兵团随后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庆阳三十里铺。

这一仗，消灭谭世林民团七十余人，缴获了部分毛毡和枪支，攻占了元城子，达到了打击北线之敌的目的。

这年五月二十八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陕甘边特委和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由刘

志丹任陕甘边特委的军委书记，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四十二师政委。

九、智取高桥

陕北安塞县有一座非常险要的山寨。寨子建立在陡峭的山崖上，崖上垒着围墙，围墙上留着一个个枪眼，崖下是深深的壕沟，壕沟上只有一架平时吊起、走人时才放下的吊桥。这就是名不虚传的高桥。

安塞县民团，就盘据在这座险要的高桥山寨中。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我骑兵团得到消息：国民党延安民团的“杨团总”要往高桥视察。安塞民团虽属延安民团管辖，但盘据在高桥的安塞民团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延安民团的“杨团总”。这是智取高桥山寨的极好机会。

我骑兵团当即决定，挑选十三名精明强干的干部战士，冒充“杨团总”一行，提前行动，前去赚取这座山寨。身材魁梧的二连一排长蔡正祥，身穿蓝大褂，头戴大礼帽，眼上架起一副墨镜，装扮成“杨团总”。他的“师爷”（即随身秘书）穿普通便衣，提着个装文件的咖啡色牛皮包。“护兵”则斜背两支驳壳枪，戴大头帽，着蓝衣白绑腿。其余十名战士装扮为团丁，全都荷枪实弹，有几名战士腰里还藏着手枪。一封假造的延安民团介绍信也准备好了，上写延安杨团总要提前去高桥等等，末尾盖有用肥皂刻好的延安民团公章。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杨团总”一行来到了高桥寨前。寨里民团听说延安杨团总到来，立刻放下吊桥，列队出寨欢迎。“杨团总”一边向两旁欢迎的民团点头致意，一边带着“随行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山寨。突然枪声响了，“杨团总”身后的警卫人员打死了看守寨门的哨兵，迅速关闭了寨门，拉起了吊桥，把民团全部关在了山寨外边。顷刻间，预伏在山寨周围的我骑兵团战士，一起冲了出来。敌人毫无准备，仓皇逃往山上。战士们勇猛地追击着，砍杀着。一连排长祁廷

珍为夺取民团头头的手枪，跳下战马，和敌人撕打在一起。那民团头头凶猛异常，一口咬住了廷珍的右手。两人正打得难分难解，另一战士赶来，背后一枪，打死了那民团头子。与这同时，山寨里蔡正祥他们也顺利地收拾了关在里面的少数敌后勤人员，活捉了三个大土豪。

由于计划周密，这一仗共打死打伤敌安塞民团三十余人，并缴获大量物资。

下午，骑兵团烧毁了山寨，驮着缴获的物资，押着俘获的土豪，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高桥。

十、西华池伏击和旬邑打“陕保”

一九三四年初秋，红二十六军由刘志丹、杨森等同志率领，驻扎在西华池。军部得到情报说，国民党驻平凉之杨子恒部一个营前来“进剿”，于是骑兵团、红三团、国际少年先锋队共五百余人悄悄地出发了，走到一条南北方向的大沟附近停了下来。刘志丹命令大部分部队埋伏在塬上，骑兵团埋伏在沟东面的崖畔上，静静地等待着来犯敌人。

第二天，敌四五百人，扛着步枪抬着迫击炮，带着少量辎重，大摇大摆地从对面塬上来了。埋伏的红军战士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动不动。敌人走到塬边上，接着又往沟下走去。等敌人全部下到沟底后，随着刘志丹的一声喊“打”声，崖畔上埋伏的红军战士，一齐向敌人射击起来，手榴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在敌群中炸开了花。

沟底的敌人晕头转向，象热锅上的蚂蚁，在沟里东窜西跑。驮着辎重的牲口，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嘶鸣着，奔跳着，践踏着敌人的尸体和伤兵。敌人的两门迫击炮还来不及支起，就扔在地上没人管了。待敌人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之后，我军冲下沟去，打死企图顽抗的敌人，抓获把枪扔在地上的俘虏。

战斗按预定计划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步枪四百多支，迫击炮两门，三捷式重机枪两挺，另有十几匹牲口和许多辎重物品。

这一营敌人妄图“进剿”红军，却没料到途中就遭到红军的伏击，全部缴械。

西华池大捷后不到十天，陕西保安团何高候部两个连共二百余人，从旬邑到三原去，路经旬邑县十里塬，就在那里休息。此时，红二十六军就住在距十里塬十里左右的一个村子里。听到这个消息，刘志丹立即率红二十六军所属之骑兵团、红三团、少先队，分两路跑步前去袭击敌人。

赶到十里塬，敌保安团正在沟畔的一块场地上休息。我军战士分两路包抄过去。敌人边打边撤，最后退进一座一人多高的土围子里。战士们高喊着：“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敌人躲在土围子里不吭气。战士们忍不住冲了过去，敌人猛烈地开枪还击，战士们又退了回来。这时候，带骑兵团前来的杨森师长跳下战马，把上衣一脱，带了两个手榴弹，手提马刀冲了上去，其他战士也都下马冲了上去。

土围子终于被攻破了，敌连长带着几个顽固团丁跳进了土围子后面的沟里，企图从那里逃跑。我们的战士也跳下沟去，把敌连长击毙了。

这一仗，全歼敌保安团两连，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我军也伤亡十余人，杨森师长左胸也负了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杨森师长左胸的那颗子弹，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东征牺牲时还未取出。

十一、五倾塬遇险和交道塬歼敌

十里塬歼灭陕西保安团三天之后，刘志丹率红军部队往北行动，走到旬邑县马栏川的一个叫田家洞的村子，天黑了，发现敌马鸿宾部之冶成章骑兵旅已经到了离我军二十来里的马栏镇。冶成章外号冶骡子，他带的一个旅很能打仗，是敌人的主力。我军没有停脚，连夜转移到离敌人六七十里的新正县湫头塬咸治村。吃罢饭，天快明了，发现冶骡子从后赶来。红军又迅速转移到离咸治五六里的五倾塬。刚到

五倾堰，冶骡子部队便分两路追了上来，一路从咸治村方向正面往我军扑来，一路沿右翼行动，企图迂回包围我们。红军立刻东撤，骑兵团二连奉命抗击，二连战士扼守在五倾堰东边的一个岬岬上。冶骡子的骑兵来势迅猛，加上我军弹药不足，火力不猛，只一会功夫，敌人就冲上了岬岬。扼守的战士退进了山上的梢林后，向石底子方向撤退，其他红军部队也边打边撤，一直退了三十余里，到了雕令关。

这次遇险，红军损失十二三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二门，许多战士被冲散了，骡马也被敌人俘去。数天之后，散失的战士才在洛河川找到了部队。

一九三四年夏末，杨森、赵国卿和我带骑兵二三百人，从延长、林镇附近的山里出来，到了交道堰。交道堰上有一个小镇，镇上住着国民党杨虎城部四十二师的一个步兵连，约九十余人。我骑兵团到了镇子附近，敌人还没有觉察，我军即向镇子冲去。敌人仓皇逃窜，我骑兵团战士四处追击，俘敌甚多，缴枪也不少。我们把俘虏的军装换下了三四十套，把人全部释放。这些军装在奇袭长武时起了不小作用。

十二、巧计诱敌

吴起镇附近的一个山寨里，住着国民党张廷芝的部队三四十人，他们白天出来烧杀抢掠，晚上便躲进寨子，附近老百姓对这股敌人恨之入骨。红军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拔掉这颗钉在老百姓心上的钉子。

寨子在半山上，易守难攻。红军如强行攻取，虽能奏效，但伤亡必大。红军领导和地方游击队研究，决定用巧计诱敌出寨，消灭敌人。

一九三四年秋天，地里的庄稼都收光了，可天气还有点燥热。一天，山寨下面的小村子里，来了几个游击队员，他们先抓了村里的土豪，又赶上土豪的牛羊往村外走去。山寨上的敌人见到后，立刻跑出寨子追了上来。游击队员们一边抵抗，一边逃跑，牛羊丢了一路，有的甚至把枪也丢到地上。敌人见游击队一触即溃，毫无抵抗能力，越

发放肆地追赶起来。正追得起劲，我埋伏在山沟里的骑兵团战士一齐策马冲了出来，一阵猛杀，把敌人全部消灭，又冲上空虚的山寨，捣毁了敌人的巢穴。

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敌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而我方却毫无损失。

十三、吴堡川伏击和曲子城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敌人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进攻，其中第二路是陕西警备骑兵团第二团。该敌过去经常对我革命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骚扰，陕甘边特委和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我骑兵团由地方游击队配合，首先给该敌一个致命的打击。

十月三十日，赤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诱敌，我骑兵团进行埋伏。敌人在追击我赤安游击队过程中，骑兵团突然对敌进行袭击，杀敌甚众，余敌狼狈溃逃，在追击过程中，又俘敌多人。该路敌被击溃后，其他各路敌人闻风丧胆，纷纷后撤。

十一月的一天，地处陇东高原北部的曲子城里，来了几个做小买卖的人，钉秤的，织箩的，还有补锅修壶的小炉匠。他们一边干活做买卖，一边和群众闲聊，日头偏西，又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到别的地方去了。对这，人们都不在意，其实这几个做小买卖的手艺人，都是庆阳游击队的侦察员，他们利用干活做生意的机会，把环县城里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

曲子是环县敌县政府所在地，城里驻着敌人一个骑兵团，人马近百，连长叫屈子鹏。还有保安团，二百余人，团长叫李恒泰，副团长叫王占英。另有一个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叫崇锦宜。敌人驻守曲子的武装总计五百人左右，加上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和职员，约近千人，准备对南梁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敌人仗着人马多，加上曲子离我南梁根据地较远，防备松懈，气焰嚣张，对当地老百姓很坏，老百姓

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红二十六军决定给曲子的敌人一个致命打击，以扩大红军影响，装备地方游击队。这一任务，由善于奔袭的骑兵团担任，让熟悉情况的庆阳游击队配合。当时骑兵团下属三个连，二百余人；庆阳游击队只有五六十人，武器多是大刀长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出奇制胜。

十一月二十四日，骑兵团在赵国卿团长和高锦纯政委率领下，从南梁革命根据地出发了。身材魁梧的连长马子英，斜挎盒子枪，威武潇洒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路经辛家沟、孙家湾子，顺便收拾了当地民团的四五条枪，又马不停蹄地赶路。当晚，由张志孝队长和王宝山政委率领的庆阳游击队和骑兵团会合了，双方领导开过会议后，又立刻向曲子方向前进。游击队员们紧跟骑兵团一路小跑，几次蹚过冰冷的环江，毫无怨言，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和热情。

我奔袭部队沿环江北进，急行军一夜到曲子附近，天刚放亮，远远望见曲子城残破的城墙，部队停止前进。一连蔡正祥排长带着二十多个便衣，先行进城。过了片刻，城里响起了枪声。我骑兵团战士快马加鞭，象一支支离弦的箭，从南门冲了进去。敌保安团刚刚起床，敌骑兵连在北门外环江边的场子上操练。我骑兵团一连飞速穿过大街直冲北门外。敌骑兵连毫无防备，丢盔弃甲，仓皇逃散，大部分拚命往山坡上爬，另外十来个敌人向环江川里跑去。

三排长周羊娃带着一班抄小路迂回奔上山梁，堵住敌人退路，开了两枪，接着大喊“把枪放下”，满坡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环江边上，二排长朱秉才和连部通讯员巩存良并马奔驰，追击着敌人。前面，一个拿驳壳枪的敌人实在跑不动了，把枪一扔就跪到地上。巩存良跑过去一侧身滚下马，欣喜地拣起了那支驳壳枪。

正在这时，忽然发现环江西岸有几个敌人骑马向北逃走，领头者骑着一匹白马，朱秉才立刻带着几个人追去。

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澄带十几个团丁向北逃跑，我骑兵团一股人马边打边追，一直追到一处名叫打瓜洼的地方，把朱文澄击毙了。

与此同时，曲子城里响着零乱的枪声，战斗正紧张地进行着。敌保安团二百余人满南山坡跑着，也有少数逃到河川里。我骑兵团二连、三连和庆阳游击队在四处追击着，搜寻着。

一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了，总计俘敌五百余人，缴枪二三百支，马四五十匹。接着，部队把俘虏押进老爷庙里，召集群众大会，杀了罪大恶极的敌保安团长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景宜、刘云天，还有一个盐局的局长。这时才知道，敌县长郑致中住在曲子城西面的山寨子，他听到曲子枪响后，骑马早跑掉了。

公审大会后，我骑兵团喂马铡草时，战士们把谷穗铡下留给群众。群众说：“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

曲子战斗灭了敌人威风，长了红军的志气，并且扩大了庆北革命根据地。战斗中缴获的武器，首先装备了庆阳游击队，骑兵团的战士每人发了一顶羊皮“火车头”帽子，大家都十分高兴。

十四、龙坊坪失利和奔袭长武

曲子战斗之后，刘志丹率红二团、骑兵团前去攻打龙坊坪。

龙坊坪在陕西吴旗县的吴起镇（今城关）附近，驻守着依附国民党的土匪张廷芝部二百余人，敌人装备优良，有很多好枪好马，且很能打仗。攻打龙坊坪之前，红军的战斗口号是：“打下张廷芝，背好枪，骑好马”。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早上，骑兵团、红二团包围了龙坊坪，把敌人压在窑洞里。但是，红军战士每人只有两三粒子弹，手榴弹也都是南梁土造的，有的不响，有的只能炸成两半，杀伤力很小。敌人欺我火力不足，凭借着优良的装备，冲出了窑洞。红军战士顶不住退了

下来。敌人追追停停，不敢和红军靠近。红军边打边退，一直撤了二三十里。这一仗，红军伤了四五个人。我的小黄马也在战斗中负伤，但它一直把我驮到山上，才倒在地上死去。

龙坊坪失利之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上级领导决定骑兵团和红二团以及红二十六军所属其他部队，分开到外线打游击。为此，骑兵团决定奔袭长武。

长武县城位于陕甘交界的西兰公路上，是西安通往兰州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由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长武城里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只有自卫团一百二十多人，武器装备是六支盒子枪，八十多支步枪，四十多把大刀，另有县政府、县银行等文职人员数十人。袭击长武，可以震慑敌人，牵制敌人的“围剿”力量。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下午，骑兵团从驻地宁县九仙塬出发了。九仙塬在长武城北一百七八十里的地方。骑兵团往南走了一夜，拂晓来到长武塬上，过了泾河，到了一个离长武县城只有二三里的村子里。带队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骑兵团团长赵国卿、骑兵团政委高锦纯一起研究决定，大部队暂且埋伏在这个村子里，挑选一批战士先化装打入长武城。

清早，雨雾弥天，骑兵团杨伯伦、蔡正祥、羊娃等二十几名，战士化装成卖菜的、赶会的、拣粪的，混杂在进城的群众中来到，长武城西门外。西城门上驻着敌人的一个班，他们按时开了城门。一会儿，只见一队骑兵分两路纵队从远处走来，前面的二十几个骑兵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这是我们在洛川北面交道源消灭杨虎城四十二师一个连后缴获的），半里路后还是大队骑兵。敌人以为是他们的正规部队来了，立刻集合到城墙上，向远道而来的“自己人”敬礼。骑兵队进了城，忽然六连一班班长张恺开枪了，哨兵应声而倒，城门口立刻一片混乱。化了装的我骑兵团战士便在城里冲杀起来，扮成老百姓的骑

兵团战士掏出暗藏武器，冲上西城门，与敌厮杀起来。半里路后的骑兵团大部分战士，听见城里的枪声，立刻向长武城飞奔而来。敌人见情况不对，立即关闭城门。

在西城门上，战士们与敌人搏斗着，三连连长郝占兴抱着敌人一起滚下了城墙。城门终于被打开了，骑在马上战士进西门后，沿大街往里冲，冲过昭仁第二小学，冲进了国民党县政府。

城内敌人听到枪声，纷纷出动，大部分爬上了西城墙，一部分跑进了城西北角的碉堡。骑兵团战士冲进县政府时，敌县长领着十几个团丁，已从东侧便门逃进了隔壁的院子。隔壁院子原来是关帝庙，敌民团团部就设在里边，并建有一个高高的碉堡。敌人从这个碉堡里，用机枪封锁了大街。骑兵团战士想冲过大街，冲进斜对面的银行，因敌人封锁而未能得手。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形成了对峙状态。敌人龟缩在东城墙上和两个碉堡里也不敢出来。宣传员李发等趁机在街道上贴满了红军的标语。骑兵团在西城区没收了几家大店铺，带着咸盐、鞋袜、布匹、纸烟以及缴获的八、九十条套筒枪和七九步枪，撤出西城门，开往泾川县。泾川敌人闻风而逃。骑兵团捉了三个土豪，往北而去。

奔袭长武一仗，虽缴获不甚多，但对敌人震动很大。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所办的《晋阳日报》报导说，陕甘红军五万余人，袭击长武县城。阎锡山夸大报导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蒋介石陕甘红军阵势很大，他阎锡山不能离开与陕北只有一河之隔的山西，以此对付蒋介石想把他调到国民党中央、吞并山西地盘的目的。

《晋阳日报》的这一报导，对红军长征选择落脚点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年九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毛主席在一所小学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那条消息，看后认为刘志丹等同志在陕北至少创立了一块根据地，因而决定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到陕北落脚。

十五、柳村塬受挫

袭击长武之后，骑兵团又奉命和王世泰领导的第三团及郭宝珊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国际少年先锋队一起去攻打柳村塬，以粉碎敌人对南梁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时为一九三五年春天。

柳村塬在合水城北七、八十里的地方，是一个低坑子塬，崖畔上驻扎着国民党马鸿宾部冶成章骑兵旅的几个连。我军在夜间把敌人包围，拂晓发起攻击，一口气冲进了敌人的院子。敌人开始有些慌乱，后来凭借优势的装备和充足的弹药，从窑洞里往外反冲。我军因装备低劣，子弹缺乏，只好退了下来。

这一仗，少先队负责人王有福同志牺牲了，义勇军和红三团牺牲的同志也不少。我骑兵团虽损失不大，但团长赵国卿、连长马子英都带了彩。

由于柳村塬战斗的失利，国民党马家队伍攻进了南梁，我南梁政府不得不迁到洛河川之下寺湾一带。骑兵团由原三连指导员康健民代理团长，东进宜川、韩城一带，开辟新的地区。

十六、开辟东区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调集陕西、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五省的国民党军五六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军事方针，同时实行“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的法西斯政策，妄图达到一举摧毁我根据地和消灭我西北红军的罪恶目的。

南梁革命根据地失守后，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我骑兵团配合游击队东进宜川、韩城、郃阳、白水、蒲城一带，任务是截断咸榆公路，牵制延安敌军，配合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巩固南区，扩大东区（红宜）根据地，利用敌人空隙，深入敌占区，发展游击队，筹集经费和物资，

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歼灭地主武装，砸乱保甲制度，造成敌占区社会秩序的混乱。

骑兵团接受任务后，首先东进到延西川高桥一带。肤施游击队在邵凤麟队长的率领下，诱出延安守敌李发福部及民团共三百余人。在高桥川口，骑兵团突然出击，歼敌一部，余敌缩回延安城。接着，安塞游击队配合赤卫队围困延安城，迫使延安守敌不敢出犯。我骑兵团则带领邵凤麟游击队继续东进，经杜甫川进抵三十里铺，遇到当地民团五十余人。敌人见我骑兵团后，没有抵抗，即全部缴械投降。

骑兵团继续前进，下午三四点钟在松树林恰遇临镇民团五十多人，护送三百余驮官商货物，遂将民团缴械，俘获了全部货物。当天黄昏进抵金盆湾，缴民团枪十五支。次日中午，骑兵团东进到临镇，全歼当地民团近百人，缴枪百余支。接着骑兵团在临镇休整三天，打土豪，分粮食，宣传红军的政策。休整后，骑兵团东进云岩，行至该镇三里之外的山上，遇到为敌军押运夏服的民团。我骑兵团立即分两路向敌进攻，俘敌四十八人，缴枪五十多支，二百多套新军服也都成了骑兵团战士的夏服。

云岩守敌只有少量民团，听到骑兵团到来的消息，他们望风而逃。骑兵团在云岩宿营一夜，打了土豪，把地主老财的粮食财物分发给当地穷苦群众。

此后，骑兵团北进云岩以北的后湫天、罗儿川、狗头山一带活动。这三处的民团是些土杂武装。我骑兵团到达后，他们主动交出步枪四十余支。我骑兵团觉得这三个地方的民团有被我争取的可能，加之后湫天等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因此没有向敌人进攻，只是在周围活动，组织地方游击队，建立农民政权。果然，后来有两处民团在其领导人郝志德和杨狗的率领下，参加了红军。

数天后，骑兵团南下宜川。一天上午，骑兵团在城北十余里的川里行军，忽然发现附近的绛头塬上有敌人埋伏。骑兵团立刻策马向塬上冲去。敌人掉头逃跑，到一崾岬处抵抗了一阵，便被我军全部消灭

了。战斗结束后得知，被歼灭的敌人是国民党之宜川县民团，共二百五十余人，民团头子冯备三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我击毙。我骑兵团二连指导员高占海（后改为高平）在这一战斗中负伤。

绛头塬战斗后，骑兵团乘胜围困宜川县城，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驻大荔县之国民党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派其伍勉之旅北上增援宜川，我骑兵团遂主动撤离。后西北前总命令，要骑兵团前往延长，配合兄弟部队攻城。骑兵团赶到时，二十六军所属之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及二十七军红一团，已攻下了延安。这一仗，歼敌高桂滋之八十四师一个骑兵连，缴获战马一百六十余匹。骑兵团分到了几十匹战马，六挺轻机枪。在此基础上，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连长是段德才。然后，我骑兵团经黄龙山到洛河川渡河至黄陵县龙坛塬休整。不久，又配合红一团，经宜川钱上，将敌民团三十余人缴械。一九三五年六月，骑兵团到韩域咎村，将民团四十余人缴械。然后又沿山到韩城、芝川、郃阳、澄县、白水、观音堂等地，所遇之民团，被我骑兵团一冲，即溃逃而去。后因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骑兵团奉命回师延川县永坪一带。时为一九三五年八月。

骑兵团的这次行动，使沿途豪绅惊魂失魄，纷纷外逃，向蒋家王朝呼救，迫使杨虎城、马鸿宾等不得不分兵防堵，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我红军部队的内线作战。骑兵团的这次活动，也横扫了统治人民的地主民团和保甲制度，为巩固南区，开辟东区，壮大地方武装，都作出了贡献。当时，宜川和甘泉以东地区，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人民斗争情绪很高涨。骑兵团经过之后，陕甘边特委派一个游击队和部分红军学员，前往宜川、甘泉以东地区，在马文瑞同志直接领导下，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并于三月二十八日成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在这次行动中，骑兵团缴获各种枪支近五百条，在临镇、宜川等地成立了游击队、警卫队和游击小组。此外，还补充邵凤麟游击队一百支枪，补充宜川抗款军五十余支枪。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在宜川、甘泉、韩城交界的黄龙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东区革命根据地。

十七、参加永坪会师和劳山战役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三千余人在徐海东、吴焕先（后在泾川战斗中牺牲）、程子华的率领下，过秦安，渡泾水，经镇原、西峰、合水一带，进入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举行党政军民大会，庆祝这次胜利会师。我骑兵团也参加了会师大会。刘志丹、徐海东等同志讲了话。会师后，原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共五千余人，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原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韩先楚任师长；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任师长；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贺晋年任师长。我骑兵团为十五军团直属部队，赓健民任团长，高锦纯任政委，刘约三任参谋长。

十五军团成立之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当时的军事形势和行动方针。刘志丹同志提出，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十五军团要南下作战，打击南线敌人之主力，具体战术是“围城打援”，以围攻甘泉之势，诱歼延安增援之敌于大小劳山之间。因为甘泉是敌人在陕北的军事重地，甘泉被围，就置南线之敌于首尾不顾，敌人必然就近从延安出兵增援，而劳山则是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在此设伏，必能奏效。如此，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可基本上打破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会议一致同意了刘志丹同志的意见。

九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经过三天急行军，从延安的东南方向绕过，到达甘泉县城以西的王家坪一带休息。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带领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甘泉以北二十里的劳山一带察看地形。劳山是一片起伏连绵的山陵，树林茂密，杂草丛生，从延安通往甘泉的公路要道，好象一条长长的口袋，夹在左右两侧的大山之间，确是打伏击战的好阵地。

当然，军团指挥部也知道，劳山北面不远的九里山，地形比劳山更险要，更有利于埋伏。但是，考虑到敌人路过九里山时，因其特别险要，必然加倍小心提防，反不利于伏击。因此，舍九里山而取劳山。

九月二十九日，十五军团指挥部派七十五师一个团及当地游击队若干，围攻甘泉县城。三十日，军团主力带三天干粮，进入埋伏阵地：徐海东带领军团部和七十五师的两个主力团设伏于口袋阵之南端，七十八师、八十一师由刘志丹率领设伏于口袋阵之北端，七十五师骑兵连到延安附近的三十里铺侦察监视延安之敌情动态，我骑兵团则隐蔽于距劳山二三里的山沟里机动策应。

这是十五军团成立后首次配合作战，指战员们士气非常高涨。埋伏期间，指挥部严令不准点火、吸烟，不准大声说话和随便移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准首先开枪。

第一天过去了，敌人没有来。第二天一个上午又过去了，仍然不见一个敌人的踪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敌人发觉了我军的行动计划？指战员们焦灼地思虑着、等待着。

原来，甘泉被围两天之后，敌驻延安之东北军王以哲部何立中师才由延安动身南下，驰援甘泉。过九里山时，何立中见公路两侧林木茂密，地形险要，怕有埋伏，便让一个团先行，沿公路两侧山坡搜索，确信没有红军之后，他才命令后续部队前进。一过九里山，何立中大为轻松，放心地对参谋长说：“龙潭虎穴已经过去，不会再遇共军的口袋阵了！”

过九里山不远，就是劳山。中午，敌军进入劳山中心地带。这里，有一个叫劳山的镇子，何立中原计划在此宿营，后见天色还早，想再赶三十里到甘泉县城，便临时改变计划，由原来的一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往甘泉疾进。下午两三点钟，敌军走出劳山镇两华里左右，即进入我军的伏击区。我军指战员对敌人的一切行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西山上指挥部的信号枪响了，公路两侧埋伏的红军一齐冲出梢林，向敌人压了过去。霎时间，炮声、枪声、手榴弹声和冲杀声，响

成一片。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晕头转向。敌师部失去了指挥能力，敌兵象受惊的羊群乱冲乱撞，一部分敌人想沿原路冲出，被我断后的七十五师堵了回来。前面，我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敌人进退维谷，只得向两面山坡奔命，或者躲进公路两侧的林木草丛之中。

这时，我骑兵团飞快赶到现场，纷纷下马冲上山头。三连长郝占兴见敌人一挺机枪正在向我军射击，便猛冲过去抢夺机枪，旁边的敌人刺伤了他，他仍然死死抓住不放。顷刻，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骑兵团战士们冲了上去。敌人很快被我军四面包围了，而且包围圈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一股企图抢占西面山头的敌人赶了回去。因为短兵相接，敌人的大炮不起作用，只好用轻机枪封锁川道。我大批战士从两面的山上向公路上压了过去。敌师长、参谋长、几个团长以及参谋和副官们，准备向东山逃跑，当经过山下小河时，遭到我东山上红军战士的猛烈射击，敌参谋长当场毙命，一个团长自杀，另一个团长被俘，敌师长何立中负伤后逃到甘泉，也一命呜呼。

黄昏，战斗胜利结束了。敌何立中师除六三〇团和六二九团五个连因未参加战斗而幸免外，其余近三千人全部被我歼灭，这就是红军战史上著名的劳山战役。这次战役中，我军还缴获敌人大炮、机枪和其他一批军用物资。部队有一些伤亡，王世泰同志也在战斗中负伤了。我骑兵团除郝占兴同志负伤外，别无损失。

劳山战役后，我骑兵团奉命到富县一带，监视和侦察洛川中部地区的敌情。红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带部分部队去富县羊泉镇侦察敌情，并在那里歼敌一〇七师一个营。

十八、参加榆林桥战役

榆林桥是咸榆公路上一个较大的村庄，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属陕西省富县管辖。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东北军六一五团团团长高福源率千余人驻守在榆林桥及附近的山上。我军如果攻占了榆林桥，切断咸榆公路，那么富县、洛川一线的敌人就不敢再往北推进。因此，劳山战役后，我十五军团主力在劳山附近休整，准备发动榆林桥战役。

榆林桥村虽然地处平坦的洛川之中，但敌人四周筑有坚固的工事和战壕，村后东北方向的山上也筑有工事和山寨，一营敌人还驻守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护卫着。要想打下榆林桥，必须采取攻坚战，而且必须首先攻占村后的山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夜间，我骑兵团随十五军团主力秘密运动到榆林桥附近。次日凌晨两点钟，我军从两个方向同时向山寨的敌人发起进攻。红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担任一个方向的主攻，红三团打先锋，首先向山寨冲去，我骑兵团也随后冲了上去。战斗刚开始，敌人有点晕头转向，但很快便调整部署，凭借山上的工事进行顽抗。我军因夜间作战，未能发挥威力，直到拂晓才向敌人展开猛攻。天亮了，山寨被我军攻占了，但我骑兵团一连连长却光荣牺牲了。接着，我军向榆林桥村进攻。敌人利用村外的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我军迟迟不能奏效。午后三时，三架敌机飞来为守敌助战。我军为了不使敌机发挥作用，立即发起全线进攻，迅速迫近敌人。敌机分辨不清，胡乱扔下七颗炸弹，其中三颗在敌军阵地上爆炸，敌军大乱，我军乘机攻进了村子，全歼守敌。但是敌团长高福源却怎么也找不见。

俘虏群里，有一个比较肥胖的敌兵。红军战士见了有点怀疑，便走上去问那敌兵：“你是高福源？”

“不，不，我不是。我是理发的。”那敌兵一边嗫嚅着答话，一边用眼角暗示着旁边，这才把敌团长高福源辨认出来。

榆林桥战役后，我军教育释放了俘虏，敌团长高福源也被一起释放了。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不但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和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促进张学良放弃“剿共”逼蒋抗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九、迎接中央红军

我骑兵团参加榆林桥战役前，由于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同志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把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秀山、汪锋、杨祺、孔灵甫、朱子休等许多革命同志都抓了起来。骑兵团政委高锦纯和赵启明、任浪花同志一起，也被抓到瓦窑堡关了起来。因此，榆林桥战役后，骑兵团的领导只有康健民和刘约三，还有一个从二十五军调来的年轻战士，大家叫他“小主任”。榆林桥战役后，骑兵团指战员听说政委被“逮捕”，都十分惶恐不安。康健民和刘约三怕自己也遭到“逮捕”，便以“筹粮”为名，率骑兵团部分战士远离红军主力，到龙坛塬一带打游击去了，肃反的人拿他们没办法。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到刘志丹等同志遭到错误逮捕时，便派王首道同志赶到瓦窑堡，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并对已经被错杀的同志平反昭雪，从而使根据地和十五军团的各项工作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康健民和刘约三听到刘志丹等同志被释放的消息后，才放心地带领骑兵团战士回到陕北的甘泉稻草铺一带。此后，中央调康健民去学习，任命贺海元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骑兵团改为中央军委直属部队。

十一月，为了打退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集中一军团、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主力，发动直罗镇战役，给进攻之敌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直罗镇在富县以西，三面环山，一条从西向东的大道穿镇而过，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并到直罗镇观察了地形，决定在这里设下一个“口袋阵”。

战前，中央红军给十五军团送来了电台和密码，并命令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往直罗镇方向靠拢。我骑兵团则在延川一带侦察敌情。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九师经合水向东，到了富县的直罗镇。次日拂晓，中央红军从北向南，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把直罗镇团团包围。战斗打响后，红军从南北两面的高山上压了下去，直罗镇立刻硝烟弥漫，枪炮声响成一片。两小时后，我军占领了敌人的师部，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但敌师长牛元峰却逃进了镇东头的一个小寨子里，继续负隅顽抗，等待援兵。敌援兵被我击溃后，牛元峰又指挥残部突围，但终于被我追击部队歼灭，牛本人也被我军俘虏。

这次战役中，我骑兵团在直罗镇西北方向的合水和直罗镇之间巡回警戒。战役前，就俘获了几十个敌人和几十袋白面。这些俘虏中，有的是敌牛元峰师的掉队者，有的则是敌人押运粮草的后勤兵。战斗结束后，又抓了许多敌人的散兵。直罗镇战役从始至终，我骑兵团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直罗镇战役后，我骑兵团和其他主力部队一起到瓦窑堡休整了十几天。休整期间，部队受到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主要领导干部的检阅。检阅的这一天，瓦窑堡北面的河川里搭了一个土台子，台上坐着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台下整齐地站着接受检阅的红军战士。检阅开始前，一位蓄着大黑胡子的首长，骑着一匹白底黑斑的花马来到会场，大家都肃然起敬。检阅开始了，骑兵团指战员骑马列队经过台前，接受首长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大家才知道那位蓄着大黑胡子的首长，原来就是久已闻名的周恩来副主席。

瓦窑堡休整之后，我骑兵团又跟随中央组织的北路军去打横山。北路军的司令员是刘志丹，政委是宋任穷。部队开到横山，没有打下来，就又转向香水、波罗一带打游击。在打游击过程中，骑兵团打了土豪，做了宣传工作。春节前，骑兵团随北路军回瓦窑堡整训。四十天后，中央组织主力部队分三路渡黄河东征。为巩固后方，我骑兵团

奉命到靖边、安边、宁条梁一带剿匪。

骑兵团从瓦窑堡出发时装备很差，虽说有三个连的编制，但有一个半连的战士没有战马，武器也少，第三连一个班才有一支七九步枪，三粒土造子弹，一般战士则只有三个土造手榴弹，而且还是铜的，扔不远，扔慢了就会在空中爆炸。由于装备低劣，骑兵团在三边剿匪过程中曾受了些挫折，不过也打了许多胜仗，用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二十、三边打游击

到三边后，骑兵团决定先打靖边县张家畔。张家畔是一个小镇（现是靖边县城），镇上只驻了少量民团。听说我骑兵团要打张家畔，离张家畔三十里的盐寨子民团在姓樊的团总带领下前来增援。我骑兵团撤走到二十里处之南山，当得知盐寨子民团驻进了张家畔街道时，便又立刻折回，拂晓冲进张家畔，守敌除个别逃跑外，其余全部被俘，那个姓樊的团总也被我们抓住杀掉了。时为一九三六年春天。

离张家畔一百二十里的宁条梁，有一股依附于国民党的土匪，匪首叫泥跛子，他手下有一百多名骑兵，很能打仗。骑兵团刚到张家畔，泥跛子就带土匪前来袭击。为避开强敌，我骑兵团连夜转移到南山宁条梁附近，去包抄敌人的老巢。

宁条梁地方不大，只有一条小街。我骑兵团赶到时，只有少量保安队防守。拂晓，我军发起进攻，打死了十几名敌人，余敌跑进碉堡，拼命顽抗。我骑兵团攻打了半天，因缺少攻坚武器，未能奏效，团长贺海元却中弹牺牲了。之后，我骑兵团撤到靖边，与三边蒙汉支队一个连一起配合作战，并到那泥河、香水堡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

香水堡是一个小镇，镇上驻着敌人的民团。离香水不远的波罗，驻扎着依附国民党的土匪史老么的一个骑兵连，以能打仗而闻名香水堡一带。

我骑兵团到香水堡后，驻地离波罗只有十里，担任警戒的一连一

排离敌人则只有五里。当地老百姓反映说：“这里离史老么骑兵连的驻地很近，不保险。”排长朱秉才把这一情况反映到连里，连里又反映到团部，但未能引起上级的警惕。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史老么的骑兵连就从后路袭击了我蒙汉支队的驻地。蒙汉支队仓促应战，招架不住，跑散了。敌人又直奔我骑兵团团部。团部只有一个机枪排和一个警卫班的武装，全无思想准备，敌人快到跟前了，还以为是蒙汉支队来了，待敌开始冲锋，我方已无应战能力。警卫排好不容易保护着团首长突围而去，但机枪排二十余名战士和六挺机枪却全部丢给了敌人。

香水堡遭袭后，蒙汉支队的队长吴彦勋被撤职。骑兵团准备返回靖边张家畔，走到安定县的青羊岔，又奉命回大后方瓦窑堡。早上走到白庙岔，有一股敌人从石湾出来阻击，我骑兵团与敌激战一小时，敌溃败逃跑。我骑兵团重新集合，准备从川里行军。当地百姓跑来报告说：“你们不敢再从川里走了，国民党的张营长带队伍从北道川里过来，要打你们。”这消息也没有引起领导的注意，骑兵团仍从川里行军。中午一两点钟，因为战士们半天来忙于打仗行军，没有吃饭，已是人困马乏。恰恰在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道川里压过来了，骑兵团无力应战，只得退进一条沟岔里。没想到这是条死沟，许多战马跳不上沟坎，战士们只好忍痛弃马上原。

这一仗，骑兵团虽然伤亡不多，枪也没有丢，但马却丢掉了近三分之一。回到瓦哲堡后，骑兵团进行了整顿，上级又重新调高锦纯任骑兵团政委，孔灵甫任团长。因为没有战马，此时的骑兵团下属两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骑兵团随主力部队西征。五月，我红军步兵部队打下定边花马池，缴获战马一百余匹。我骑兵团得到一部分战马，补充了原来的一个步兵连。此后，骑兵团又开始独立行动，和敌人打仗。这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泥跛子和张廷芝，他们都是国民党榆林井岳秀部收编的土匪头子。我骑兵团住在离定边四十里的彭家滩。红二

十九军在原上的乔家洼子把段宝珊部打跨，我骑兵团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安边的砖井以东。这是骑兵团重新装备后的第一仗。

韩家渠击敌，是骑兵团重新装备后的第二仗。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陇东军分区副司令赖传珠同志带部队在三边剿匪，司令部就设在安边南面的韩家渠。韩家渠是一个浅沟，南面是山，西面是坡，北面是平滩。司令部的窑洞，就在浅沟两边的崖畔上。

一天拂晓，张廷芝的土匪包围了韩家渠。敌人共有两个骑兵团，步兵二百多。赖传珠等被敌人封锁在崖畔上，冲不出来。

此时，我骑兵团住在离韩家渠二十里的韩家洼子。早上，大家正在遛马出操，一匹战马从韩家渠方向急驰而来，送来了剿匪司令部的告急信。骑兵团立刻集合，向韩家渠奔去。上午八时许，我军赶到了韩家渠，机枪手李发首先向敌人扫了一阵，枪声一停，战士们挥动马刀冲进敌阵，东拼西杀，把敌人的步兵一个个砍成了“血脖子狼”。消灭了敌人的步兵之后，又追击敌人的骑兵，气一直把敌人赶回安边城里。这一仗，我骑兵团歼敌二百余，自身伤亡四五人。

韩家渠击敌之后，我骑兵团驻到盐池县。一天下午接到通知，说张廷芝的土匪在盐池以西六七里的石山子一带闹得很凶，命骑兵团前去围剿。我骑兵团当即出发，傍晚到了石山子。队伍刚刚落脚，上级下来命令，说敌人在关滩子，让骑兵团连夜进剿。当我赶到关滩子时，敌人已闻风而逃，我骑兵团追了一阵也没有追上。天刚麻麻亮，又在沟池发现了张廷芝的队伍，于是又出发追击，在沙窝里和敌人周旋了整整一天，追到安边，终于把敌人打垮，俘敌八十余名，缴获好马几十匹。但是，我骑兵团十几名战士在追击过程中却牺牲了，许多战马也累垮了，战士刘彦华一人就骑垮了两匹战马。

打垮了张廷芝，我骑兵团到定边县张家洼整训了两个月。然后，到宁夏的洪城、磁窑、惠安堡一带，进行武装游击和宣传活动。收秋以后，骑兵团返回定边县。又过了一个月，胡宗南部从南面向我根据地进攻。我骑兵团配合二十八军，阻击胡部于大水坑一带。与此同时，

我主力红军聂荣臻部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结束语

山城堡战役后，骑兵团再没有打过大仗，但也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七年春，骑兵团由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和张浩政委指挥，开赴镇原附近的赤城、三岔待命。同年夏天，因周恩来副主席劳山遇险事件，骑兵团经西峰、合水到富县剿匪，并警戒交通线。“七·七”事变后，骑兵团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担任警戒。之后，一度编进贺龙同志的一二〇师，准备东渡黄河抗日。后因土匪张廷芝、杨候小等三千余人又在三边闹了起来，骑兵团遂奉命回三边，配合贺晋年指挥的八十一师红一团进行剿匪。红井滩一战，我骑兵团一举歼灭张廷芝土匪二百余人。此后，骑兵团曾配合内蒙古工委，到五原和阿陶旗一带活动，打击伪蒙司令部，还曾在风川、葫芦河、南泥湾等地搞大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骑兵团离别陕甘宁根据地，开赴大青山。在那里，这支陕甘根据地最早的骑兵队伍打了许多胜仗，被扩编为一个骑兵师。由于作者的经历和搜集的资料有限，山城堡战役后骑兵团的活动，只能待有条件时再详为介绍。

〔附记〕在撰写本文之前，曾到环县、曲子、庆阳、华池、镇原、西峰、合水、泾川、长武、富县、宜川、韩城、合阳等地进行了考察，并访问了参加过骑兵团的老战士宋飞、杨伯伦、郝占兴、曹崇庆、张玉福、巩建良、朱秉才、刘彦华、李发、杨贵才等同志。在此，谨向为撰写本文提供过资料和帮助的同志致谢。

一九八二年六月

（董汉河整理）

关中突围和收复关中的回忆

姚 知 一

关中，即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一个突出部，辖新正、新宁、淳耀和赤水四县，南北狭长，形状如囊，子午岭支脉纵贯全区，山岳丛林遍布。这块地盘，过去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根据地，关中分区产生后，又成为政治军事要地，象刺向胡宗南的心脏——西安统治中心的一把刺刀。同时，它又控制着敌人两条交通动脉，一天之内东可出击咸榆公路，西可出击西兰公路，两天之内可击西安。因此，敌人在进攻延安之前，首先进攻关中。

合围与突围

一九四七年春节后不久，胡宗南反动派调兵遣将，突然对关中进攻合围，使它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可是关中永远不屈服的军民，挺起胸膛，奋起反击，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和合围。

敌人合围关中，是利用它囊状地形，三方面受封锁线包围对我不利的形势，采取了口袋战术，把关中党政军全部装在口袋里，然后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妄图一举消灭。敌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作战部署，是以突如其来的行动，调动敌四十八旅一部分兵力，由正宁县的山河镇出击，沿东向山梁东进；以敌一百六十五旅一部分兵力，由宜君的建庄镇出击，沿西向山梁西进，以雕翎关为目标，进行钳形合击，以便切断我军退路；敌一六五旅另一部分兵力，经宜君县的关门子，沿转角川，以锥形战术向关中首脑机关的马栏突进；敌四十八旅另部兵力从旬邑县出动，向关中西部的清水塬进攻；敌五十五旅沿爷台山，向关中南部进攻；敌十二旅经凤凰山，向关中东部的庙湾和柳林镇进攻。这样紧迫严重的情况，关中首脑机关事先毫无所知。我们警三团

当时在庙湾、衣食村一带抗击凤凰山敌人，对此亦无察觉。

二月七日午后，我们团接到庙湾留守骑兵通讯员紧急报告，说旅部要我去庙湾接电话，什么事，当时我们几个团干部也无从猜想，只觉得气氛紧张，叫我接电话，这也是我作团参谋长的份内事，因而我就纵马急驰，三十里路程一气赶到。我拿起话筒刚听了两句就中断了，幸亏这两句话听清楚了，就是命令我团二营归南线指挥部（简称南指），其余全部在翌日拂晓前撤出雕翎关。虽是没有头尾的两句话，但也可以领会意图了。我急忙返回，同团长葛海洲、政委曹光之等同志进行分析后，于黄昏时把部队从抗击阵地上撤下来，在衣食村集结动员后，就开始夜行军。由于部队没有来得及吃晚饭，经过一夜急打军，又饿又累，行速慢了下来，同时又要去旅部联系，因而部队到达马栏上川的五沟口时，就原地暂停歇脚，烧水吃饭。我们刚吃完饭，骑兵通讯员惊慌地返回报告，说马栏各机关空无一人，去向亦无踪影。后来我们才知道，关中党政机关人员和马栏地区部队是根据中央军委紧急电令，在新四旅部队的掩护下，在敌军合围圈合拢之前就已全部撤出。我们团由于路远没有来得及跳出敌人的合围圈。

我们听了通讯员的报告后，觉得情况严重，意识到已经陷入敌人合围之中。这时距雕翎关还有三十多里，且要路经转角，而那里敌人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显然按原来撤退路线和时间是不允许了。但现在又该往哪个方向撤呢？我们商量后，决定从五沟口北山方向突围。当部队沿着荆棘丛生而陡峭的山路爬上山岭时，只见横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山梁上，敌人的长蛇队形在相对而行，先头部队已于雕翎关合拢了，我们背后的马栏川也是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这时，我军首尾临敌，左右又是深沟密林，这样就把我们部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困在了这条山梁上，敌我双方互相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各级指挥员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决定抗击敌人到入夜后突围。后来多亏我团侦察员和前卫连战士机智周旋。他们是充当部队尖兵的，一看到十多个敌人向我们前来联系时，就机警地急进到一个马鞍形山凹南端，向敌人联络人员主动喊话：“我们是马栏川上来警戒的！”敌人询问我

军番号时，我们侦察员还是用这句话搪塞对方。因为双方距离较远，喊话不易听清，敌人也懒得走过来检查，所以就瞒过去了，避免了战斗。我们蹲在山梁上，虽然可以泰然处之，但心里却十分焦急不安，考虑着怎样突围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难题，也是突围成败的关键问题：一是怎样在夜晚摸出丛林地带；二是怎样找到敌人封锁线的薄弱地段打出去。我意外地找到了当地回民游击队，他们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也掌握当天敌人情况，于是我们就埋藏了重武器和辎重，组成突击部队，准备夜间轻装突围。入夜后，满山梁敌人燃起一堆一堆的篝火取暖，当时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在游击队引导下，于二月八日夜间开始突围，抄取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钻出丛林，找到敌人防线上的一段空隙，千余人就悄悄地通过去，只是在后尾部队通过时，敌人才发觉射击封锁，但在道路两侧我掩护部队的还击下，全部胜利地完成突围任务，进入了新宁县安全地区。

留守关中的“南指”部队，为了对敌避头击尾，当时就匿迹林区，借森林和群众的掩护，同敌人进行周旋，搞得敌人疲惫不堪，而我军和地方党政人员却安然无恙，结果敌人的有兴而来，败兴而归。

占领与收复

我们警三团突围出来在上畛子川休整时，收复关中的指挥部成立，由刘懋功、杨伯伦、王秉祥、葛海洲等同志参加，刘懋功同志任总指挥。我们团（欠二营）归指挥部指挥，于三月上旬由上畛子川出发，到新宁县杨家塬子进行作战准备。部队经过动员后，指战员们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命令，特别是关中土生土长的子弟兵，为收复家乡，拯救亲人，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跨出去，把侵占边区的敌人消灭光。

我军怎样跳出去才能出奇制胜呢？关键是如何隐蔽通过敌人封锁线。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对敌情、地形和路线进行了详尽的侦察，同时又派出小股部队潜回山区，把突围时埋藏的迫击炮、重机枪及弹药运到预定地点。出击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部队于三月十

五日（或十六日）黄昏由杨家塬子出发。我跟侦察人员为向导，以香火为路标。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路线，选择在敌人眼皮子地下溜过去。部队刚一跨进关中的土地，指战员们就情不自禁地悲喜交集，他们看到秀丽可爱的山川，一往情深的父老兄弟，就喜不自胜；而当看到家乡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惨状，听到亲人们对敌人罪行的血泪控诉时，又引起了他们内心的无比悲痛和愤怒。深沉的爱和强烈的恨，更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我军每到一宿营地，每打一仗、特别是打了歼灭反动军队的胜仗后，那些拄着手杖的老人，怀抱孩子的妇女，热情的男女青年和孩子们就围拢上来，有的关心地问长问短，有的愤怒控诉，有的带着渴望收复关中的心情看望部队。他们关心部队的吃住问题，给部队让房、让灶，帮助做饭，同时又情深意切地鼓励部队早日消灭反动派，早日恢复关中人民的幸福生活。当我军向他们宣传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和我军必胜、反动派必败的道理以后，群众就转忧为喜，脸上露出希望的微笑。他们把过春节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慰劳军队，老大娘把核桃、红枣、熟鸡蛋强往战士口袋里塞，不少指战员感动得流下泪来，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杀敌的决心。

我们部队开进关中，经过两天急行军，渡过马栏川峡谷河流，翻过一连串的崇山峻岭，于三月二十日傍晚到了庙湾西川。与“南指”接头后，指挥部决定第一仗先打庙湾镇之敌。敌人一连多兵力，不敢驻镇上，而固守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头上，地形险要，工事坚固，鹿砦障碍遍布。我们便用第一营，配属了迫击炮，以夜袭战术夺取。但因为察看敌情地形的干部同部队失去联络，指挥作战的干部不明情况和步骤上的失误，又加上山高坡陡，重火器难以发挥作用，因而一夜连攻几次均未成功。第二天凌晨饭后，指挥部决定不再啃这块“骨头”而去寻找“肥肉”吃，吃饱以后再去啃那块骨头。自我们沿香山川隐蔽进至川口时，先头部队送来耀县敌军谍报组长等二人，经审查，搞清了耀县敌情。中午，我先头部队打垮了柳林耀县保安队，因为敌人已知我军打庙湾，吓得成为惊弓之鸟，同我们部队一接触，就惊慌地跑到驻墓坳的敌人那里去了。我们在柳林镇吃过饭后，为了避免打消耗战，对墓坳之敌只虚张声势，引而不发，部队却沿去墓坳路线爬上

九里坡，向西突然一转，进至柴场子、北庄子等村宿营，准备同“南指”部队在关中南线寻机歼敌。（“南指”所辖部队是敌人合围关中时我们留下坚持游击战的一支地方部队）

第二仗是在高儿塬击溃陕西保安第四团的遭遇战。我军在第二天吃过早饭，沿高山槐蜿蜒山脉的南麓西进时，墓坳敌人向我军跟踪而来，我们发现后没有理睬，只令三营后卫部队加强警戒，部队继续前进。当我前卫连（第一连）刚过沟爬上了坡，与陕保四团突然遭遇，原来这是敌人从照金地区“清剿”失望而返回的路线。敌人前卫部队发现我尖兵排时，先于我军占领有利地形，在一个山包上喊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我们的战士机警灵活，一面回答说“打共产党的”，一面迅速接敌开枪冲锋，后继部队也紧跟了上来，猛打猛冲，一连冲垮前后三个山岭上的敌人，如洪涛卷沙，势不可挡，打得敌人莫名其妙，措手不及，狼狈回头溃逃，把抢来的东西和行李丢了一路，连无线电台也丢掉了，可惜的是电台滚下深沟摔成了废物。由于作战地形是鱼脊形的一条山梁，不便包抄，加之天色已晚，因而我们没有继续追击，只俘敌二百余人。

三月二十四日，夜袭铁王歼灭战，这是第三仗。敌人是陕保七团第一营，他们第一天到达，第二天就被我们消灭。高儿塬战斗结束后，我军第二天中午到达了桃村河。这是过去老苏区的一个村庄。贫苦农民一看到部队，惊喜地“啊呀”一声，接着就说，“这一下把我们的部队可盼回来了！”他们热情地款待我们。隐蔽活动的赤水县委干部闻讯赶来，向我们报告铁王敌军的情况。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感到良机已到，没有白跑路。总指挥立即下决心，准备歼灭这股敌人，要我带领侦查员去查明情况。我把搞清的敌情在预定的接头地点报告给总指挥时，夜已过半，部队也到达了临时集结地点。总指挥当即部署三营从正面进攻，一营从东边堵击，“南指”部队夺取村西碉堡，控制跨沟桥梁，切断敌人退路。铁王是农村集市所在地，部队多数人很熟悉，因而当突击连隐蔽接近敌人驻地时，敌人还在梦乡，他们只知关中有游击队，根本没想到会遭到我军包围。我突击组摸到跟前，敌哨

兵才发觉，还没等他惊问之声落音，我军就勇猛迅速地以手榴弹“轰隆”声作了回答，接着急促嘹亮的号声，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主攻营紧随突击连投入战斗，东西两面部队也攻了上来。敌人三面被我包围，另一面又临深沟。他们从梦中惊醒来糊里糊涂地抵抗一阵之后，就只好向我军缴械了，只有敌营长等几人跳沟逃走。天亮后战斗结束清点，共俘敌三百余名，缴获机、步枪三百余支，弹药一批。我新四军中原突围时被俘的十余人，也从敌军中解救了出来。

四月二日，又进行了长舌头塬战斗，这是第四仗。那时候，王世泰司令员率警三旅五团歼灭了五亭子和岳牛坡敌人后南下关中，高锦纯旅长率旅直单位也返回关中，我团第二营在参加了岳牛坡战斗后也随旅部返回归建。我们经过铁王战斗后，就开向长舌头塬会师。这时，职田镇敌人约一营兵力向我军进袭而来。我们以一个连的兵力扼守吕家沟圈迎头顶住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迂回断敌后路，以便前后夹击，不料在部队翻过沟进至下墙村时，被敌人发觉而未能成功。敌人虽然免于被歼，但也受到一次严重的教训，再不敢轻易侵犯边区作孽了。

四月四日，小塬子战斗，这是第五仗，也是打得最干脆利落的一次伏击性的歼灭战。敌军是整编第十师美械装备的一个营，老番号为八十三旅二四八团第三营。由于胡宗南反动军队合围关中扑空后向延安进攻，我军乘机收复了关中，连续歼灭入侵之敌。因此，敌人就调动主力军的二四八团进入关中清剿。开始，他们以为我军还在柳林地区，便赶到那里，扑空后又转至至石门关，企图以这个交通枢纽为据点，以营为单位，四处游剿。

四月二日，我后坡村军事会议决定，要我们警三团配合“南指”部队到照金地区寻机歼敌，仍由懋功同志统一指挥。我们团于三日下午到达桥儿沟、西庄子、大小狮子等村，“南指”则在史家道村。我们刚一到达，当地群众即告诉我们石门关来了敌人。与此同时，旅部电令我团连夜返回，准备配合警五团歼灭职田镇出犯之敌。总指挥同我们几个团干部商量，觉得打职田之敌不如打石门关之敌比较现实，因而复电申述理由。午夜，得到旅部赞同的答复。我们在请示上级的

同时，派出精干的侦察小组，由侦察排长率领，夜晚潜到石门关附近监视敌人行动。第二天早饭后，侦察排有名的“飞毛腿”侦察员大汗淋漓地跑回报告说，敌人约四五百人从石门关出发，沿戴家山山梁向我军方向前来；其余侦察员在另一条山梁上，同敌人隔沟相望，边监视边返回中。我和总指挥听后，立即跑上七级石村的山梁上，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敌人一路纵队沿山脊前进，我数了约有四百多人。总指挥立即下了决心部署兵力，通讯员飞马传令，坪队风驰电掣般奔向指定地点。距我们最近的三营立即赶到帝家河滩。在敌人后尾部队下山落沟后，就从敌人屁股后面发起进攻。距我们较远的二营急速地抢占了小塬子，六连首先拦头堵住敌人，同敌前卫部队展开激战。距我们更远的一营和迫击炮连，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均赶到加入战斗。我军既抓住敌人的头，又咬住敌人的尾，把他们堵进一面坡上，前后上下夹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在战斗中，我军的手榴弹发挥了巨大威力，无数颗手榴弹象伴随暴风而来的雹雨，从山坡上一排排打下来，一条沟霎时被硝烟笼罩，变成一片烟海。经过两小时激战，除敌副营长等少数人逃脱外，俘敌营长以下官兵四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四挺，防坦克火箭筒、战防枪、轻机枪、步枪以及司登式冲锋枪三百多支。

战斗接近尾声时，石门关敌人又派出一营兵力，沿着被歼敌人的路线到达中指梁前来增援，可他们只是隔沟打枪打炮，根本不敢接近我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伙一个个当了俘虏。后来，我们的“南指”部队也赶来参战，同时太阳将要落山，敌人只好夹着尾巴溜了回去。从此，敌人以小股部队深入我区游剿的战术破产后，很快便退出关中，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地到边区来骚扰了。

我军在这次战斗中，所以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要归功于人民群众的掩护。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是亲密无间，坚如磐石。

在小塬子和长舌塬战斗之前，还有一次智取三嘉塬的细嘴子战斗。这里敌人的工事，构筑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酷似吊在崖边上的一颗苦瓜。它几乎四面临空，仅由一条吊桥与村庄相接，地势非常险要，

要拿下它极不容易，而那时还没有直射炮可摧毁它，曲射炮又难以命中，用爆破更难以接近。这些敌人非常狡猾，是一群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不拔掉这个钉子，群众不得安宁，对我军活动也很不利。

我团三营把敌人围困了三天三夜，拿不下这个据点。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两名战士送来了从细嘴子村出来的一个老汉，指挥战斗的副团长李荣芝同志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紧卷的纸条，打开一看，原来是细嘴子敌军向湫头镇敌军求援信。这封信启发了我们，于是决定伪装敌人，以假增援而智取敌据点。我们用缴获的服装，化装成敌军官和十余名士兵，作为“增援部队”的先头部队，于第四日中午鸣枪开炮而去，我围攻部队则佯装退却而走。当我化装的指战员接近据点时，敌人信以为真，敌自卫队长亲自出来迎接。我化装连长要求“共同追击敌人”，敌自卫队长就把他们的四十多个士兵全部叫出据点。我化装连长当即一枪击毙敌队长，其余战士一齐动手，后面的部队也扑了上来，给敌人以严厉惩罚，敌乌龟壳不攻自破。战士和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我军收复关中的作战，从三月中旬末到四月上旬初，不到一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共七次，环行关中一周，除马栏敌人外，全部扫清了各个据点，我党政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马栏敌人后来由于孤立无援，也偷偷地逃跑了，关中分区又重新显示了生气勃勃的面貌。

一九八二年二月

回顾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生活

贾 长 明

一九三六年五月至十一月，我曾在中央党校普通班学习。半年的党校生活，使我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使我了解了红军的宗旨，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对我一生的革命生涯起了启蒙和鞭策的作用，我永生难忘。

我刚进入中央党校的时候，党校的校址在瓦窑堡。当时，瓦窑堡是党中央所在地，除党校外，红军大学也在这里。人们都说：“党校学文，红校学武”，意思是党校是学政治的，培养政治干部；红校是学军事的，培养军事干部。我们在瓦窑堡只住了一个月，就随着党中央一道撤出，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为什么要搬迁？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宣传抗日，扩大党的影响，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达到预期目的后，又胜利回师陕北。蒋介石看到我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气急败坏，老羞成怒，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陕北，遂任命张学良为“剿共”副总司令，向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但经老山一战，在我党的影响下，张学良已和我们有了来往，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为了使它能够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主动从瓦窑堡搬到保安，让张部占领瓦窑堡。表面上看，张学良取得了“剿共”的重大胜利，其实是我们党和他共同商定的，是争取张学良迷惑蒋介石的一着棋。保安是个贫穷的小县，一下子把中央机关都集中到这里，给当地群众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减少群众负担，党中央决定向外疏散一些中央机关。八月份中央党校就迁到了定边县，我们在定边一直学习到毕业。

由于那时处于战争时期，党校不仅经常搬迁，而且经费非常困难，因而党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学习条件也很简陋。且不说和现在的中央

党校比，就是和现在的一个普通的县党校，也是无法相比的。就拿上课来说，连个避风遮雨的教室都没有。在瓦窑堡时，还有个更大的窑洞，上课时学土能有一半坐在里边，一半还得坐在外边。到了保安和定边后，连这样的窑洞也没有了，上课只能在露天的场院里。每次上课前，我们把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摆整齐，然后坐在石头上听课。党校没有宿舍，教员、学员都住在群众家里。当地群众的住房本来紧张，加上我们这么多人，就更没处住了。我们把群众放柴的窑洞或倒塌不能住人的窑洞借来，自己动手维修一下，就当作宿舍。少数人能睡在门板上，大多数人是在地上打草铺。学员的行李和衣物都很简单，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参加不久的新干部，还没有发订李，只有几件衣服，是用自己织染的土布（当地人叫小布）作的，颜色花杂，深浅不一，记得给我发的一双鞋就是鲜绿色的，但我们不讲究，穿什么都无所谓。团以上的干部配发一个皮包，写字时还可把纸垫在皮包上，我们一般干部只从发个用布做的饭包，所有学习、生活用具，包括吃饭用的碗筷，统统放在里面。每个班有两个脸盆，既洗脸，又打饭。党校的伙食，虽然规定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五分钱菜金，但当地油、盐、蔬菜都很少，有时有钱也买不到，肉、蛋没有见过，主要吃的是野菜。野菜要靠自己挖，烧柴要靠自己拾，粮食要靠自己背。记得有一次到几十里以外的乡村背粮，因口袋不够用，有的同学就把外面的裤子脱下来，扎上裤口当袋子用。大家逗趣地说，一物要多用，裤子当口袋，装上黄小米，背着挺方便。

尽管党校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却非常高涨。当时中央党校共分三个班，有研究班、高级班和普通班。研究班的学习对象是红军中的老干部，高级班是培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层干部。我们这期普通班的学员，大都是红军东征时在山西参加革命、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同志，据说是为将来在山西开辟工作而准备干部的。我们学习的主要课题是“党的建设”、“游击战争”、“政权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还经常搞时事政策教育。教材是教员根据毛主席的论述而编写的，联系实际，浅显易懂。由于纸张困难，不能印发讲义，靠教员讲大课。教员讲，学员记，课堂秩序非

常安静。校长董必武同志，教务长成仿吾同志，我们普通班班主任廖志高同志，都在露天场里给我们讲过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讨论，加深理解。教员讲的问题，都是从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然后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加以说明和解释，引导大家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从而指导革命实践。因为没有教材，加之学员也缺乏笔墨纸张，每个月能保证发两支铅笔就算不错了，谁如果能搞到一瓶墨水，那可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靠自学、靠自己写笔记是受条件限制的，只能靠大家在一起漫谈、研究、讨论，逐步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实际上，通过这种讨论式的学习，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就全面了、深刻了，往往还不易忘掉。

党校的生活，既紧张严肃，又活泼愉快。那时都是军事化编制，每个教学班都编成班、排、连，每天早晨要进行操练，一个人发一根木棍，操练时当枪用。每个教学班还发两支大枪，供晚上站岗放哨用。党校纪律非常严明，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不能动群众一针一线，有时群众请我们吃饭，都婉言谢绝了。开饭、听课、参加社会活动都要列队前往，不能自由行动。每周开一次班务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大家都不客气，有啥说啥，从不隐瞒错误、姑息错误，因而促使一些违反纪律的同学都能认识错误，并及时加以纠正。学校规定每星期六不上课，专门帮助群众做事。到了这一天，男同学就和群众一起下地做活，女同学则帮助妇女在家操持家务，纺线看孩子。利用这些机会，我们搞些社会调查，以实践和补充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开一次娱乐晚会，有的唱歌，有的扭秧歌，有的打拳耍武术，有的说笑话出洋相等，班与班之间还互相拉歌子，丰富多采，气氛活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圆满地完成了学习计划，从中央党校正式毕业，分配到中央宣传部任巡视员，满怀着革命激情，奔上了新的征途。

一九八一年七月

参加长征的片断回忆

张 明 远

我原系甘肃岷县人，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甘肃连续大旱，再加上兵连祸接，我家几乎没有收成，生活陷于绝境，我就去岷县吃粮当兵，参加了甘肃的地方部队。后来冯玉祥到了甘肃，这支地方部队编入国民军。在冯、阎反蒋失败后，我们又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开赴江西“剿共”。到江西宁都后，给养不济，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此时，在我党中央工作的原冯部军政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向孙连仲部驻宁都参谋长赵博生、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同志进行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终于促成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个师、两个旅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后，我们改编为红五军团，休整了半年，就开到高雄县水口镇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适逢一方面军保卫局在战士中挑选侦察人员，我被选中了，经过一段集训后，被提升为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便离开了五军团。红军长征前夕，一方面军调回瑞金，我被调到国家保卫局，旋由国家保卫局分派到三军团任保卫局侦察科长。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开始长征，我在彭老总的第三军团任侦察科长。一九三五年七月，一、四方面军会合，成立红军总司令部。长征到了毛儿盖，党中央开会确定北上抗日。红军过草地时，总部决定分左右两路：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率领北上；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红军到了贵州札喜县，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侦察队，我被调到司令部当徒步侦察队长。侦察队跟司令部行动，任务是侦察敌情、绘出行军路线图、找向导等三项，这对部队行进和指挥作战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侦察队经常走在部队的前头。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们部队出腊子口到了岷县，决定在这里休整，补充给养并做群众工作。岷县城当时为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十四师驻守，红军包围了县城。中央指派何长工同志为甘肃省主席。我当时为岷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命我在县里筹集军粮给养。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回老家三十里铺，先找到我的表兄季农。他在地方上还有点声望，于是我请他告诉周围群众，就说我在红军里工作，现在回家来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在，我是十六岁出门的。因此，邻居、亲戚听见我回来了，都跑来看我，又听说我是“县长”（农民习惯把管理一县之事的都叫县长），十分高兴。我就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将要开往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经过充分发动，把群众组织起来了，就开始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当时岷县站里恶霸地主张树岩，大寨地主刘十一，砍堡塔地主秦太林、马七一，平日压榨农民，无恶不作，便分别组织群众召开了斗争大会，控诉揭发了他们的罪状，为民平了愤除了害。

我家乡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他的几个姑娘都嫁给鲁大昌的部下做老婆，他就仗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还把庄子附近和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去作烧柴，收租时又用大斗坑人。我们就派人把这个地主抓来，严加管教后放其回家。

我军围攻岷县四十多天没有攻开，我在家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也呆了四十多天。这期间除打土豪征购粮草外，还进行了扩兵工作。我的家乡土地瘠薄，人民生活困难，又都对红军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扩兵工作一展开，立即有近三千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当红军。我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团，自己兼任团长，到会宁后，便把这个团交给了五军团。后来这部分人随五军团到达河西高台，不幸竟全军覆没了。

岷县县城没有打开，我们的部队撤下来向会宁前进，我也随部队离开了。到会宁后，我们和一方面军迎接我们的部队会了师。在这里休息了五、六天，保卫局又给我配备了一百名战士，命我到西兰公路沿定西一带去打游击。我们在西起车道岭、东到华家岭一线，阻击国

民党的的小股部队，扣截过往的国民党军车及军用物资。

在西兰公路兜圈子打游击约三、四天，从敌人飞机的来去方向判断，估计我们部队已过会宁了，便率队追赶部队，一直到海原和靖远之间，才遇到四军一位领导同志，他告诉五军团已全部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总部已有命令，没有过河的再不要过了，一律随总部到陕北去。不久，我们见到了朱德同志，他也命令我们和他一起走。我就跟随朱总司令到了陕北保安，仍旧回到中央保卫局工作。

率众起义，投奔边区

张 志 亭

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西北战场上国民党正规军某部毅然哗变反正，宣布起义，投奔陕甘宁边区，给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当头一棒。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起义的情景，总是思绪万千，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由于我们及早觉悟，回到人民的怀抱，才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烧 香 结 盟

一九四三年冬，蒋介石为了包围、封锁和蚕食陕甘宁边区，命令国民党第十七军（高桂滋）划归三十八集团军统辖，由河南浉池防日前线调往甘肃固原（现属宁夏）一带。当时，我所在的新编第二师六团二营被派往固原东边的城子杨家驻防，具体部署是：五连驻赵渠伪第一线，六连驻孟原为第二线，四连、机枪连、营部为后防。

那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和许多下级军官，对日寇的残暴行径十分气愤，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政策极为不满，对我们民族的分裂忧心忡忡，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有了初步认识，都不愿与共产党为敌，为蒋介石卖命。四连排长许建章，原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成员，国共合作初期曾在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受过训，接受过共产党的教育，他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更是深恶痛绝。由于我们部分青年军官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因而经常在一起发泄对蒋介石的满腹牢骚。特别是归编以后，蒋介石的嫡系公开排斥我们这些划归过来的异己。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不得不时时提防。因此，由许建章和我几个人发起烧香结拜兄弟，以“拜把子”为名，联络了十几名

排长、军医、书记等青年军官，其中有鲁照业、隋云鹏、贾元魁、李克勤、刘文忠等人。这样，就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积极力量，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部队到达固原后不久，军部抽调一部分军官集中进行所谓的学习，实际上是为进攻解放区作准备。一周的学习，主要是由军参谋长讲解形势、八路军边区驻防部队番号位置以及部署等情况。这次学习，我们联络的青年军官大部分都参加了，结束后，许建章等人又被派往第一线修筑工事。这样，我们便有机会了解到八路军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前往第一线修筑工事的许建章等人，耳闻目睹了八路军纪律严明，以民族利益为重，艰苦抗战的事实，并在我们结拜兄弟中传开以后，大家都为八路军将士抗日救国的革命精神和边区进步的民主政治所感召，十分向往解放区，这就为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哗 变 反 正

半年以后，在六月下旬的一天，二营营长从下属的报告中得知许建章行迹可疑，准备把许调到营部工作。营部书记当天下午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许建章，许立即找我进行商量。我感到事不宜迟，建议当晚举行起义，投奔解放区。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与其他连队的人员联系，我们便决定首先拉起我们两人所在的四连，尔后扩大起义成果。

那一天，恰巧我是连队的值星官。黄昏前，利用连队到河边泡脚而连长又不在现场的机会，我把全连集合起来说道：“谁愿意抗日救国，不打内战，请站到许排长后边！”由于大部分士兵都是抓来的，加之我也是苦出身，在士兵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经这一说，整个队伍呼啦啦地都站到了许建章身后。看到这个情景，我心中暗暗高兴，接着又问了一句：“今晚带着你们投奔八路军，大家愿不愿意？”话音刚落，队伍里好似翻滚的油锅中撒了一把盐，一下轰动起来，随即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愿意！”“好，那么全体人员从现在起听从我和许排长的指挥，回去秘密做好准备，天黑以前谁要走漏风声，可别怪我

不客气！”讲完话，我又专门向几位班长作了安排，并对整个起义行动进行了具体布置，一切就绪了我才将全连带回。

天黑以后，按照事先的布置，乘连长回宿舍睡觉之际，首先派人扣押了连长和司务长，剪断了连部和营部周围的电话线，封锁了所有通往村外的道路。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就把四连拉了出来，由许建章和鲁照业带到村外隐蔽，进一步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我和机枪连排长贾元魁带了十几个人直奔营部驻地，乘其毫无戒备，活捉了营长，并将营部其他人员集合起来，由我带往四连隐蔽地点，贾元魁则刚赶回机枪连集合队伍，向四连靠拢。

机枪连到达以后，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将机枪连夹在四连和营部中间，立即向六连驻地出发，快到六连时，我派人通知该连隋云鹏和李克勤二位排长：我们已经起义，你们赶快行动。六连闻讯立即拉了出来，随同我们一起向五连驻地开进。

意 外 情 况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到达五连驻地附近。这一夜的急行军，除了抓获的营长在翻越大沟时逃跑外，再无一人掉队。我们虽然比较疲劳，但是望着已经拉起的队伍，不由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把大家平安地带到解放区。

为了慎重起见，我与许建章等人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了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力争不用武力，以营长的名义写个通知，命令五连带到孟原领受任务，乘机缴下他们的枪支弹药；二是在五连出早操时冲上去，首先抓连长，然后解除全连的武装。经过分析，我们确定按第一个方案行动。

于是，我与许建章带领四连的二十个人直奔村内，正赶上五连出操。五连连长见面便问：“大清早你们来干什么？”

“营长命令我们来暂换你们的防，让五连赶到孟原领受新任务。”

我一面出示盖有营长私印的通知，一面回答。

五连长看了看通知，信以为真，便命令部队收操吃饭，并同我们一起到连部交接手续。就在这时，我突然掏出了手枪，对着五连长大声说道：“不许喊叫，你被看出来了！”许建章立即下了他的枪，把他看押在房子里。

我转身出去，带着人员直奔饭堂。正在吃饭的士兵看到这种阵势，一个个目瞪口呆傻了眼，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候，我们的结拜兄弟、五连三排长刘文忠刚好赶到。我当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们由三排长指挥，谁不听招呼就当场枪毙。”我看了看刘文忠，把他叫到一旁悄悄嘱咐说：“我们先走一步，你赶快集合队伍，随后到高庄崖（此地距五连有十里路程），我们在那里等你。五连目前比较混乱，连长又是个老滑头，你千万要当心。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把五连的枪支先带走，到了高庄崖再给你们。”

离开五连后，我带着四连、六连、机枪连和营部人员，先行到达了高庄崖，但是一直等到天黑，仍不见五连的踪影。我们预感到情况有变，当即决定次日凌晨率现有部队投奔解放区。

事后才知道，由于刘文忠缺乏经验，当我们离开后，他竟动员老奸巨滑的五连长响应起义，这个老滑头当即满口答应，待刘文忠为他松了绑后，突然翻了脸，把刘文忠抓了起来，并派亲信到团部告急，连队也采取了防范措施。

走 向 光 明

我们这支起义部队急匆匆地向着陕甘宁边区开进。由于事先没有与八路军联系，驻马渠的八路军三八五旅四团二营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在没有弄清我们真正意图的情况下，团指挥所下达了战斗命令，并派参谋长张书祥到前沿察看。为了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决定部队原地待命，派许建章前去联系。

许建章到二营说明情况后，受到了八路军的热情赞扬和接待。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三条协议：一、考虑到起义部队思想现状，暂不整编，保持原建制；二、人员暂时一个不调，武器一件不动；三、一切军需物资与八路军同等待遇。

就在我们原地待命的时候，国民党十七军的一个师长高增基亲自带领骑兵营尾追上来。这一突然情况的出现，使起义队伍有点混乱。我也十分着急，心想：“前面不见八路军接应，后面又来了追兵，究竟如何是好？”但是，我坚信八路军一定会欢迎我们弃暗投明，因而当机立断：先打追兵，边打边向八路军靠拢。我们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摆开了阵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许建章带着八路军四团领导和二营部队以及解放区的民兵前来接应。在我的坚持下，由我率一个加强排与八路军两个排阻击追兵，部队向马渠转移。

担任阻击的部队依托有利地形，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打得敌人伤亡惨重，狼狈窜逃。我们抓了几十名俘虏，缴获了一挺机枪和部分步枪弹药，我方无人伤亡，顺利撤离战场，安全到达解放区。至此，起义宣告成功。

这次起义，参加官兵三百余人，携带步枪二百余支，短枪五支，轻机枪九挺，掷弹筒九具，重机枪四挺。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正规军哗变反正第一例，有着巨大的影响。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为震惊，曾不知羞耻地向八路军提出遣返要求。鉴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我党不便公开宣传这次起义，可是，我们反蒋爱国热情，弃暗投明的功绩，却深深印在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起义后，我们仍按一个营的编制，辖四个连。响应起义的机枪连长刘仲华任营长，我和许建章、隋云鹏、贾元魁分任一、二、三连和机枪连连长，三八五旅四团保卫股长任教导员，并给每个连派了一位指导员主管思想教育。

我们这支队伍，在曲子整顿了一年时间。边区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地方政府的亲切慰问，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通过一年的整训，我们接受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成了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当时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同志，多次亲临我营检查指导工作，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从此以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活跃在西北战场，先后参加了延安、蟠龙、青化砭、扶眉、瓦子街、兰州等西北著名战役，直至中华民族得到了独立，祖国得到了解放。

当年参加起义的人员，相当一部分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献身，少数同志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已经担任了部队各级领导职务，个别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而含冤九泉。为了悼念牺牲的烈士们，为了告慰含冤而死的同志们，为了与还健在的战友们，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建设再立新功，我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中曾蒙云南农业大学许建章同志帮助回忆，在此仅致以谢意。

（兰州部队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怀念牟玉光同志

王 定 国

我常想，人的一生不可避免要有一些憾事。的确，我在去年就留下了一件不应有的憾事，这就是牟玉光同志健在的时候，我未能实现她的邀请：“重返一次兰州”，和她再见一次面。到如今，她的音容笑貌虽犹在，不幸已经尘世隔，“梦中常见默无声，伤情只有千行泪”，她已作古人了。

牟玉光同志是抗战时期在甘肃张掖牺牲的著名革命烈士高金城同志的夫人，当年我们尊称她为“高太太”。

我不能说深知牟玉光同志的生平，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兰州同她第一次见面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离开兰州去延安，只相处了三年半的时间。在和她相处交谈中，知道她是山东德州人，家境贫寒，曾勤工俭读医学，在协和医院工作过，一九三四年到兰州和高金城同志结婚后，开设福陇医院。然而，虽是相说短，留存记忆深，外称高太太，内是同路人。我之所以怀念她，是因为她对革命、对人民作出过贡献，作出过牺牲，她是一位值得人们纪念的人。

抗日战争前，她和丈夫高金城同志在兰州开办医院，由于从事进步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七七事变后，高金城同志目睹国事日非，祖国大好河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千百万无辜同胞遭到敌人的枪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九三七年在张掖和我一起工作时，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但是，我拥护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是救国的。”

“共产党是爱国的，是坚决抗日的。”这是牟玉光同志当时的信

念。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办事处彭加伦、朱良才等同志派高金城到甘肃张掖一带营救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牟玉光同志坚决支持，并以她在兰州开设的助产事务所为联络点，转送我失散同志回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那时，红军西路军由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使一部分干部战士不幸失散了，有的甚至病倒在千里荒凉的河西走廊。为了找到这部分革命力量，她坚决支持金城同志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去张掖设立一所营救红军失散人员的医院。那时虽然在大政方针上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分子仍然仇视共产党人，到张掖去营救红军是要冒风险的，但她和她丈夫一样，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高金城同志去张掖后，和我们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陆续使二百多名失散和病倒的红军指战员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牟玉光同志当时在兰州，也同样在做寻找我红军战士的工作。她是兰州有名的产科医生，利用工作之便，结识了许多上层人物的太太，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及言谈，她了解到在兰州秘密关押了我们的一批红军战士，于是立即报告给我们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修权等领导同志，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使这些同志获释，如林坚、华全双等同志都是这样得救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行政工作。一天玉光同志告诉我，兰州有一个收容所有我们失散的一些女红军。我便以驻兰州办事处要雇用炊事员为名，找到了柳秀英（张秀英）、罗民秀两同志，后来经我们多次去收容所联系，又找到了失散的红军几十人。这些同志经兰州办事处营救，大多数回到了延安，年老有病者则由组织资助回原籍老家。

一九三八年初是牟玉光同志一生中经受严峻考验的日子。由于高金城同志致力于营救红军失散的指战员，这年农历正月初三被反动派暗杀。玉光同志在大难当头，却表现得异常坚定，她没有被这不幸的

噩耗吓倒，反而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张掖，向敌人头目韩起功提出要求查明高大夫被害的原因，并严办凶手。韩起功在她的浩然正气面前，不得不假意表示要追查凶手。就在这种极其悲愤的情况下，竟想不到她在返回兰州时，除带回了她十岁的小儿子高士杰外，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带回了杨淑兰、万子英、钟成秀（钟一平）三位红军女战士，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丈夫蒙难以后，玉光同志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和对党的深厚感情，她毅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担任党中央和毛主席驻兰州代表的谢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告诉她暂时留在党外继续为党工作更为有利，她接受了谢老的指示。也就是从这时起，她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在思想上已经站进了党的行列。四十二年后的一九八〇年，她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不负初衷，甘肃省委组织部接受了她的入党要求，于这年八月一日批准了牟玉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她终身的夙愿。

下面有关牟玉光同志的往事，尤其使我难以忘怀：

（一）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准备随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当时我身边有两个孩子——定定、飘飘，他们都是玉光同志接的生。她对孩子们很有感情。她考虑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从兰州到延安路途遥远，当时边区又被国民党封锁，物资缺乏，生活困难，恐怕孩子带不好，希望把一岁多的大女儿定定留下为我抚养。她的盛情我很感谢。我想，她的丈夫高金城烈士被敌人杀害，女儿又病死，家里经常被特务监视，并遭到搜查，为革命她被敌人害得家破人亡，她还要为别人分担困难，她已经为我们的一位同志林坚抚养了一个孩子叫安安，我怎么能再加重她的负担呢！她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真是难能可贵。我对她说：“我们走后，你的处境更加险恶，我不能再给你增添麻烦。”并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希望她多多保重。几十年前我与牟玉光同志依依惜别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二）一九四六年，我在延安见到从新疆回来的张文秋同志，介

绍了有关牟玉光同志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六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遵照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双十协定”，释放了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的一百多名我党的同志回延安，并派遣刘亚哲先生（刘是牟玉光同志的女婿）担任护送任务。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我们的同志从新疆路过兰州，住在东校场营房内。牟玉光同志从刘亚哲处知道这一情况后，心情非常激动，一定要去看望这些同志，因为其中有些人是当年路经兰州去新疆工作的，她认识。就在六月二十五日他们出发前夕，牟玉光化了装戴上墨镜，去到了东校场。她终于找到了张文秋等同志，她们紧紧地握着手，热泪盈眶，相互问候，诉说着久别衷肠。她告诉张文秋说：“请转告同志们，这次你们是真正回到家了——延安。护送你们的刘亚哲是我的女婿，一路上他会照顾你们的。你回到延安后，务必代我问候谢老和王定国同志好，问候彭家伦、伍修权、朱良才等同志们好。祝你们一路平安！”（解放后刘亚哲见到我又介绍了这些情况，六〇年牟玉光来北京看望谢老时也谈起这些往事）牟玉光同志在我们党驻兰州办事处撤离后，处境非常困难，但却仍然热爱党，坚持做群众工作。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是很可贵的，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

（三）一九七六年六月，是我和牟玉光同志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她获悉当年她曾营救回来的红军女战士杨淑兰同志逝世后，竟不顾八旬高龄，从兰州来到北京参加追悼会，表加了她对革命战友的一腔深情。追悼会后，我留她住了些日子。也就是在这次，她邀请我在她活着的时候，一定要重返兰州一趟，要陪我到当年高金城同志蒙难和我们共同战斗的地方——张掖去看望一些健在的老同志。她还说：“别看我老了，我还能对党工作几年啊！”毫无疑义，我答应了她的要求。但是，后来当我准备成行时，却传来了她逝世的噩耗，使我深感悲痛。这里，我用《西江月》一首追祭玉光同志在天之灵：

犹忆京城一别，

音容常记在怀。

茱萸插遍待人来，

举杯斯人宛在。

革命意志不改，

万人共仰荣哀。

灵前强抑泪潮来，

四化征程永迈。

一九八二年元月二日

我所知道的高崑山烈士

王 子 庄

高崑山烈士被害已经三十三年了，但他的声容笑貌，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和高崑山烈士认识的比较早。一九三〇年春，我们先后投入冯玉祥西北军系统苏雨生部的第八旅（旅长谷莲舫）和第九旅（旅长石英秀）。部队驻在宁夏平罗县及其郊区。我在九旅旅部工作。崑山在八旅学兵队当学员，学兵队队长为张东蛟，副队长是高岗，学员大部为共产党员。六月间，苏部奉命开往平凉填防，在固原为黄得贵、李富清部所阻，返回宁夏又受马鸿宾部堵截，苏雨生的第七旅又倒戈叛苏了。此时八、九两旅不得已也脱离了苏雨生，由宁安堡（现为中宁县）撤至下马关（豫旺县）暂住。当地人民目为“土匪”。部队因无头主，粮饷无着，尤其在下马关回民回民地区粮秣供应十分困难。为了改变当地群众的看法，部队组织了宣传力量，主要是演话剧和街头宣讲。我和崑山当时都很年轻，热心宣传工作，演话剧以学兵队学员为主，我也参加了这次宣传活动。当地群众逐渐对我们部队改变了看法。此时，我和崑山同志有了接触和认识。当年八、九月间，八、九两旅在下马关都有一部分减员和分化，于是又开到甘肃靖远县，合编入雷中田的新编第八师第三旅，石英秀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部队初到靖远时，群众仍有一些疑惧心理，地方人士也对我们部队持疏远戒备态度。在“双十节”国民党国庆时，部队参加了纪念会，为了改变群众对部队的观感，有意识地在部队中布置官兵在大会上自由讲话。大会开始后，先由当地党政头头讲话，继由旅参谋长曹文参讲话。在自由讲话中，接连不断地出现十多名下级军官和学兵队学兵登台讲话，他们都身扎小皮带，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讲台上，不拿讲稿，大讲国民革命问题，谈吐侃侃，生动活泼，得到群众的惊叹。崑山同志

当时也是个学兵，是上台讲话人之一。同年底，部队开往定西县城郊一带。嗣因团长王子元同旅长石英秀闹矛盾，雷中田改任王子元为工兵营长，王即率原八旅的官兵数百人由定西开到兰州。此时崑山同志在王部已任排长职务，我仍在三旅旅部当书记官。一九三一年春，雷中田改任王子元为游击支队司令，部队又开驻靖远县。石英秀的第三旅移防静宁、庄浪、隆德三县。同年底，陕军孙蔚如部入甘后，石英秀的第三旅改编为新编十一旅，我在该部任少校参谋。王子元部改为警备旅，崑山同志此时已升任该部的连长职务。

一九三二年春夏间，张东蛟、张秀山、孙作宾、李慕愚、王儒林等同志先后在王子元部举行暴动。崑山同志也参加了兵暴，失败后潜回兰州，过黄河铁桥时，为邓宝珊部守北门的岗卫扣留，幸遇守城部队的排长李泽民同志（我地下党员）营救释放。一九三三年秋，他又投入第十一旅第一团任团部副官，我这时任十一旅一团中校团副，驻在会宁。一九三七年十一旅由甘肃奉命开到陕北榆林附近。一九三八年春，调崑山同志到一营二连当连长，我被调到二团当营长。后我因通共等罪名被邓宝珊撤职，在敌总司令部以参谋空名义软禁，至一九四三年我借故由榆林去安边，十一旅大部于四一年已开驻三边，此时崑山同志又改任一团副官职务。我就住在他的家中，不久我任旅部参谋主任。后改旅陈旅长病故，曹又参任旅长，我和牛化东、冯世光诸同志推荐他当一团军需主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十一旅在安边武装起义，在起义发动紧急关头，他胜利地执行了组织给他的任务，起义后提升为第一团副团长。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胡敌军进攻延安，宁夏马鸿逵部卢忠良率步骑炮部队一万余人向我三边进袭，我关中、陇东、延安、绥德分区主动放弃。大约三月二十日左右，一天狂风怒吼，尘沙遮日，卢忠良部进攻盐池，我驻盐池的十一旅第一团赵级山部不支撤退。当时我任十一旅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同副司令郭宝珊同志率第八团为野战机动部队，十一旅第二团担任坚守定边任务。第一团退至定边后，即归郭和我指挥的野战部队序列。四月初，定边尚平静无事，我们所指挥的

野战机动部队奉命在定边城南閤门子一带休整。四月三日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刚吃过早饭，突然听到枪声，我忙和副司令郭宝珊出营观察，就发现敌人向我进攻，我八团（含一团）齐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至下午三时给敌惨重打击后，我军亦伤亡很大，弹药不多，遂不支后撤。在撤退中，敌人以火力、人力并追，并以数千骑兵向我撤退部队左右迂回堵截，遂致我军建制全乱，形成各自向南山撤走。我因指挥骑兵连向我左前方敌骑阻击，以掩护步兵撤退，遂将战马掉在最后。我乘马经城东南马沟泉一带向南山撤走时，崑山同志骑马在我前面急驰。此时，敌人已在我们左前方山梁上居高临下堵截，我们的侧方是一条沟，情况紧急。我在马上边驰着边喊道：“赶快下马跳沟过对岸！”一瞬间，崑山的马被敌人射倒，我即下马同他一起跳下了沟。这是一条东南、西北向的涧沟，沟中无水，很长，深约四、五米，但因洪水冲刷，两岸峭陡，攀登困难。我们就寻路攀缘而上，一直上到中间，却发现上面还有一人高的崖垠。我们互相争着蹲下，让对方踏肩而上。他坚决要我先上。为争取时间，我就踏上他的肩头，先上了沟，随后将他吊了上来。此时，我的一个警卫员已被俘，一个乘机冲出了。我们两人上沟之后，仍向南山奔走，隔沟的山上敌人用机枪向我们不断射击。他对我说：“参谋长走快些！”我说：“我走不快。”为了不连累他，我就对他说：“为了减小目标，我们最好分开突围。”所以我们就分手了，谁料这一分手竟成了永诀，追忆往事，令人惨然。这一天竟是我九死一生的一天，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我们分手后，我一人徒步行走不远，遥望见我们的骑兵连，跑过来一位战士要扶持我，我就让那位战士赶快跑向骑兵连，告诉连长张占奎一定要等我。我到了骑兵连要了一匹马，就带着骑兵连从敌骑间隙中冲出，顺利地脱离险境，突围到达营地。事后得知，崑山同志在我前面走着，又收容了我军的一些散兵，并遇到了副司令郭宝珊，也失去了乘马，见到敌骑又向郭追来，他就告诉郭说：“司令员快走，我来掩护。”为了掩护郭副司令员突围，崑山同志不幸被俘，押到宁夏，后又转到兰州，先在大沙坪监狱，一九四八年转入敌西北长官部的“青训队”，终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遂被送到“特种刑庭”。在

敌人严刑逼问之下，烈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根据崑山同志生前给我所谈，他加入共产党是在绥德上师范时，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了。据他谈，当时绥德师范党的活动很多，他看到假日或晚上同学们秘密开会，便跟踪寻去，要求加入，这样就入了党。我和烈士一九三〇年相识，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下午五时左右诀别，前后达十七年之久。烈士为人爽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直率，个人生活又极其简朴，能团结群众，在新旧部队中都获得了上下级的爱护。

因时间过久，有些事实或有出入甚至错误，谨就记忆所及，提供以上资料，供参考。

人民的艺术家张寒晖

高 文

张寒晖是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他创作的《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优秀歌曲，早已为人们熟知，受到群众普遍喜爱，脍炙人口，流行全国。可是，由于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今天，除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外，人们对他的名字是不甚熟悉的，对他的了解就更少了。为此，我们简要介绍这位人民艺术家的艺术生涯，以纪念先烈，激励后人。

张寒晖，一九〇二年春生于河北定县西建阳村一个贫寒的清末革新派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一九年，他考入保定高师附中读书，曾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十月初，他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这期间，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组织领导了“艺专工人俱乐部”、“北平青年俱乐部”，并组织“五五剧社”，编辑出版《五五剧刊》，发表过剧作《他们的爱情》，参加演出过《终身大事》、《英雄与美人》、《一片爱国心》和《醉了》等新戏，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因此，“三一八”惨案后，他遭到北洋军阀警宪的搜捕，被迫停止学业回家务农，并放弃留任艺专助教而去帮助定县民教馆搜集研究秧歌民谣，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对民间艺术也有了较多接触，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观点在他心头开始萌芽。

一九三〇年，张寒晖再去北平，随即加入“左联”，负责组织剧社的工作。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搜捕迫害，他又先后到大名第七师范、定县职业学校当教员，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进行革命文艺活动。一九三一年春，他应同学之邀，到西安民教馆任职，组织流动图书文库和举办各种展览会，积极把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主张付诸实践，编演了富于西北地方色彩的话剧，为陕西工农大众演出，搞得非常活

跃。至此，张寒晖经过十多年颠沛流离，广泛体验了人民疾苦，受到了民间艺术熏陶，从实践中掌握了“利用旧形式，要会钻，钻进去，还能够钻出来”（张寒晖语）的本领，使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形式成为他运用自如的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至生命终结的有力武器。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曾回家乡发动农民运动的张寒晖受党派遣，再度来到西安，进入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工作，任东北军政治部游艺股长，同时又兼任西安二中、黎明补习学校、民兴中学、东北竞存学校的教员，在东北军和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还邀集进步人士，编辑出版面向劳苦大众的《老百姓报》，发行到陕西各县和河南、甘肃、晋西南等地，深受群众欢迎。西安事变后，他主持东北军的“一二一二剧团”，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囚禁了张学良将军、又迫令东北军撤离西北后，张寒晖随军停留在安徽境内的陇海、津浦铁路线上。他看到广大东北军官兵思念故土不能归，奋起抗战又不准的悲痛心情，忧恨交加。为了唤起部队将士和全国人民救亡图存，他以北方妇女上坟的哭声为基调，创作了《松花江上》这首歌曲。他又亲自教给东北军官兵，进而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首浸透作者爱国激情的歌曲，呼唤人们流着泪团结起来，流着泪收复失地，成为一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著名战歌。然而，张寒晖只是通过他自己之口把歌传播出去的，因而当歌曲印刷出来的时候，署名便成了“佚名”，这位卓越的爱国作者反而不为人们所知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张寒晖进入日夜向往的陕甘宁边区。他看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就放弃了他酷爱的艺术事业，从事经济工作，帮助边区发展造纸工业。一九四二年五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多次打电报欢迎张寒晖到延安，他才又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担任了边区文协秘书长，后来又到文协戏剧委员会工作。大家知道他是革命文艺战线的一位老同志，能编演戏，当过教员，办过报纸，搞过农民运动，还会造纸搞工业，又是著名的《松花江上》的作者，对他十分尊重。但他却异常虚心，埋头苦干，深入实际，兢兢

业业，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前进，创作了表现教育俘虏的《打开脑筋》、歌颂边区民主选举的《从心底里看人》、反映人民拥护子弟兵的《太平车》等曲子戏秧歌剧，取得了文艺大众化地方化的新成果。一九四四年初，张寒晖和柯仲平同志一起来到陕甘宁边区大生产的模范村——陇东华池县城壕，深入生活，帮助工作。他从群众那里学唱民歌，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营养，和柯仲平同志共同创作了秧歌剧《城壕村》。那里流行着一首叫《推炒面》的民歌，张寒晖非常喜爱这首民歌的曲调，从群众那里学来后，经过他熔铸提炼，创作了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军民合作歌》（即《军民大生产》），一时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呀么嗨嗨，大生产呀么嗨嗨……”那优美雄壮的歌声，激励着解放区广大军民开荒生产，支援前线，为彻底挫败蒋介石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至今，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仍然广泛地流行全国，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宝库中的一枚珍品。张寒晖在边区所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大众。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这位受人尊敬的文艺战士，由于患重感冒转成肺水肿，心脏衰竭，抢救无效，不幸长辞了他毕生从事的革命艺术事业，时年仅四十四岁。他逝世后，安葬于延安的边区文协山头上，以表达人们对他及其艺术事业与文协山一样永世长存的敬仰心情。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在悼念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你的作品和你的为人，作风一样，是非常踏实、结实、深刻，非常群众化的”，张寒晖同志确实是这样。

今天，张寒晖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但是他的《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优秀的艺术遗产，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仍然深受着人们的喜爱。张寒晖无愧是我国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农民诗人孙万福

高 文 巩世锋

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曲子县，有一位闻名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农民诗人叫孙万福。

孙万福一八八三年出生在曲子刘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一直务农，一字不识。但是，他作诗编歌却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乡间闹秧歌、耍社火，他都能编出许多唱词来。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孙万福带头组织变工队，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一九四三年，他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在毛主席接见劳动英雄的座谈会上，孙万福双手紧紧抱着毛主席的肩膀，激动地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孙万福心头的诗情歌意一齐迸发出来，当即编出了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
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为咱们能过好光景，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
丰衣足食吃饱饭。

边区人民要一心，
枯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的枯树盘了根，
开花结籽靠山稳。

后来，贺敬之同志对这首歌词帮助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几十年来，这首民歌从陇东、陕甘宁边区唱到了全中国，广泛流传，脍炙人口。

在这次劳动英雄大会期间，孙万福诗情勃发，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创作才能。在一次会上，他一口气就作了五首，这是其中的一首：

半辈子福——务树木，
眼前的福——压粪土。
七十二行，庄稼为强，
一粒落地，万粒归仓。
劳动英雄，秋夏二令，
做的大大垛它一场。
打下来先完这一点救国公粮，
剩下的余粮吃起来比人家都香。

孙万福的诗歌及其艺术才能，一时轰动了延安，“劳动诗人”、“才慧过人”等赞誉到处传扬开来。周扬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写道：“这个老头（孙万福）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象诗一样，简直是很出色的朗诵啊，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呢！”他说，“孙万福算得一个优秀的诗人”。

陕甘宁边区幸福美好的生活，艰苦愉快的劳动和斗争，尤其是蓬勃兴起的秧歌运动，给孙万福的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那次英雄大会以后，孙万福又创作了许多新诗歌。他在《歌唱毛主席》的诗歌里，热情地歌颂了边区一派新气象。这里节录两段：

毛主席他一来，
衙门大敞开，
谁有苦来谁有冤，
一起吐出来。
打倒土豪大恶霸，
穷人把头抬。

毛主席定计划，
遍地开红花，
老百姓掌大权
再不受欺压。
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人民坐天下。

孙万福的诗歌创作，取材丰富，内容广泛，具有浓郁的陇东乡土气息。当时，担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同志积极组织领导分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被评为边区的模范干部。孙万福

就在《马专员》这首诗中赞颂道：

陇东分区六县，
马专员挂了牌，
组织六县人民发了财，
赛过周朝的姜太公，
稳坐钓鱼台。
组织的土里生金，
万物都能来。

抗战时期，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军民建立了鱼水深情。孙万福为了感谢人民子弟兵和王维舟同志，创作了《王旅长》这首诗：

陇东分区六县人民广，
头一个英雄，
是咱三八五旅王旅长。
第一个兵多将又广，
保卫我们六县的人民
大人生产娃娃长。

孙万福还运用自己的诗歌，热情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了配合边区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他创作了《二流子要转变》的诗歌：

二流子，馋又懒，
东游西浪吃洋烟，
把好人吃成瘦人，
瘦人吃成病人，
病人吃成坏人，

吃得腿长脖子细，
家里没有二亩地。
公家听着要反对，
邻家骂你没志气，
婆娘骂你没脸皮，
又没米，又没面，
娃娃扯住你的衣。
因此一心要转变，
葫芦、烟灯一齐拌，
受奖励，勤生产，
多开荒地多种田。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孙万福在曲子为变工队买油后返回途中，涉水过河时被洪水夺去了生命，终年六十一岁。《解放日报》为他发表了《讣告》，延安鲁艺剧团及陇东分区文艺团体也都纷纷开会或写文章，悼念这位优秀的农民诗人。孙万福遗留给我们的诗歌作品，必将鼓舞我们为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来 信 摘 登

甘肃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我的《乔山西麓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一文，经我这次在庆阳参加甘肃省党史会议调查，才把原庆北政府保卫队长名字查清了，在华池县志上写保卫队长杨占鳌，还有我的名字。如你们未刊出，请即更正。原来我写的是×占彪，这是回忆错了，请费神改过来。如已刊出，请在下期资料上更正也好。

王 英

1982年6月13日

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十二辑八十五页罗杨实写的杨干丞介绍他的堂侄杨国智应为堂弟。

杨干丞

1982年8月15日

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读了郑得堃同志口述的《传播革命火种的“兰州派报社”》一文，其中有关我和兰州生活书店的事情，感到不尽符合实际，在第一三一页最后一段中，有如下的一些：

一、天水生活书店是被国民党查封的，不是被迫撤回的。

二、盘查兰州生活书店账目，在门市部邮“邹韬奋辟谣启事”，

并无其事。国民党派员查账是查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账，邹韬奋辟谣启事刊登在重庆的报刊上。

三、我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素不相识，也牵不上亲戚关系，从未请我吃饭和谈话。只是有一次，当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的丁宜中夫妇（夫人王德谦和我抗战前在上海相识）宴请路过兰州去新疆的沈雁冰同志（即作家茅盾）夫妇，邀我作陪，席间丁宜中婉转谈到生活书店的经济问题，茅盾同志当即说明自己和书店关系较深，知道生活书店经济上没有问题（原话记不起）。除此之外，我在兰州没有和国民党官员有什么交际往来。

因事隔久选，追忆有误，或把几件事情的前后情节张冠李戴等，实为难免。除已致函郑得堃同志外，特为函告，请你考虑作适当处理，如将来有再版机会，请予改正。

薛迪畅

1982年8月17日

甘肃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办公室：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阅后，对于王平水同志《我在陇东工作的片断回忆》中所提出的若干史实，经我苦心回忆，有不够符合之处。该文三十六——三十八页说，“从三八年初开始（主要是李铁轮同志任特委书记期间），由于执行了王明右倾路线……认识到原来在年初李铁轮同志到延安开会带回来传达的一套东西是错误的。”对此，我作如下几点说明：

1. 一九三八年我未去延安开会，也未“带回来传达一套东西”，只是马文瑞同志由延安去曲子时绕道庆阳城，他奉中央或边区党委之命传达了王明的讲话。当时袁国平同志在西安听到林老传达，回来又向特委传达一次，并说这个讲话改善了国共关系，避免了因摩擦加剧而可能招致关系破裂的危险（大意如此）。

2. 在我任陇东特委书记期间，并未取消或改换民运会等的名义。庆阳县委（对外是民运会）的负责人是刘国声、王××、吴承志等同志，而当时王平水、李廷序二同志均未调到庆阳县委。

3. 抗日救国会后来改为抗敌后援会，这是服从统一战线的统一名称，但掌握权力的领导班子仍是原来的领导人，例如庆阳抗敌后援会仍掌握在陆为公、吴承志、黄质文等同志的手里，仍具有半政权的性质，一切工作照旧，并未贬为一般群众团体而把已经取得的权利让给了国民党。

4. 我曾提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应该社会化、职业化，但在根据地，我从未这样提出或布置过。特委在庆阳县搞了一个商店，叫县委领导同志住在商店里，以商店工作人员的面目出现，这些都不是我任特委书记期间的事情。

阅毕这一专辑之后，我坚持我在《回忆陇东特委工作》中的看法：“王明路线在陇东曾起到一些消极作用。陇东特委为了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基本上是贯彻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的。”在我任特委书记期间（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七月），情况大体如此。

李铁轮

1982年9月5日

甘肃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传播革命火种的“兰州派报社”》一文，由于事隔久远，我这里又没有任何资料可查，也没有可能和以前当事人的同志们核对，因此现在看来有记忆不准的地方。为了保存历史真实面貌，现特函告你们，请作适当处理。1. 第一二五页第一行“报社从一九三八年年中起”一语中，“年中”应为“年初”；2. 第一三一页十七行“先是在一九四〇年春迫使生活书店在天水的分店撤回了兰

州”一语，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写的：一九四〇年春我主办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一次到生活书店去，碰到从天水来的薛天鹏，谈话中我讲了我办榆中书报社被当局以房产是公产，公家要用房子为由，非要叫停业，最后被查封。薛天鹏讲，他们天水生活书店也是当局迫使房东收回房子，逼得无法营业，由正街搬到了偏僻的陋巷，在陋巷仍不能正常营业。薛天鹏当时没有讲他们被捕的事，因此我不可能知道被捕的事。这句话应改为“生活书店在天水的分店被迫搬到陋巷后，书店的两同志又遭到逮捕，释放后到达兰州。”3. 一三一页第十九行“四月间又盘查兰州生活书店帐目”一语欠妥。那时，我有时去生活书店，碰到国民党人员从书店出来，同时看到柱子上贴有铅印的“邹韬奋辟谣”，就将这两件事给联系起来了。应改为“盘查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账目”。4. 第一三一页倒数第六行“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则利用亲戚关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一段，据薛迪畅同志来信说，他同朱绍良素不相识，也牵不上亲戚关系，从未请他吃饭和谈话。只是有一次，当时任省府秘书长的丁宜中夫妇宴请沈雁冰夫妇，曾邀他作陪。因此，应改为“时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的丁宜中夫妇（夫人王德谦和迪畅同志在抗战前上海相识）宴请路经兰州的茅盾同志，邀迪畅同志作陪，席间丁宜中婉转提到生活书店的经济问题，茅盾当即说明自己和书店关系较深，知道生活书店经济上没有问题。”同时，薛迪畅同志当时尚未入党。5. 一二八页第五行“一些旧书铺子的人”一语，意思表达得不确切，应改为“有的人光看书不走”。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郑重远交待我，组织上已给有关党员同志讲好，要买延安版书籍如党内学习材料，可到书店后头光看书不要走，等到没有人时再悄声问：“有新书没有？”要我售书时注意，遇到这种情况，就将当时不能公开出售的延安版书籍卖给。6. 一三三页第五行“周焕章”应改为“周焕丰”，“边区”应为“徽县”。

郑得堃

1982年11月9日